

北魏太宗、世祖朝的繼承問題與政局

羅 文 星*

摘 要

拓跋政權立足中原後，面臨政治社會體轉型的大問題，在君主繼承體制上即是一具體表徵。在太宗、世祖朝邁向長子繼承制過程來看，最大的阻力、威脅與不穩定因素，仍是來自於政權自身與各種傳統勢力，包括世祖自身對體制定位的不明確及不同於慣例的作為，各種傳統勢力延伸形成複雜狀態而難以防範等。東宮的建制也處於轉型階段，至世祖時東宮的規模始致完整。鮮卑貴族出任東宮的輔政大臣，在政權上形成優勢型態，崔浩與他們的競爭、鬥爭從太宗朝廷續到世祖朝末期，凸顯出東宮局勢的動盪。東宮的情勢一向在世祖的掌控中，太子晃的勢力雖有擴張成長，但應不致於過度膨脹。爆發正平事變的關鍵因素在於，宦官宗愛利用傳統勢力威脅繼承體制，使得繼承體制再度遭遇挫敗與危機。因此，彰顯出政治社會體轉型之不易。

關鍵詞：繼承體制、太宗、世祖、太子晃、崔浩、正平事變

*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復健科助理教授。

The Succession Problem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s of Taizong and Shizu of the Northern Wei

Lo, Wen-hsin*

Abstract

The Tuba regime (拓跋政權) encountered major problems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in Zhongyuan (中原). The critical issue was the system of monarchical successio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primogeniture institution during the reigns of Taizong (太宗) and Shizu (世祖), the greatest threats came from the regime itself, including Shizu's uncertainty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stitution and his unconventional leadership style, and from various traditional forces that were difficult to resist. The crown prince institution (東宮), which was also in a transitional stage, was completed during Shizu's reign. When the Xianbei (鮮卑) nobles became regent-councilors of the crown prince and assum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politics, Cui Hao (崔浩) was forced to struggle with them. This conflict highlighted the unstable position of the crown prince. Although the power of Prince Hoang (太子晃) had been growing, it was still closely monitored by Shizu. The "Zhengping Incident" (正平事變), in which the eunuch Zongai (宗愛) intervened in the conventional succession, led to a crisis that revealed the difficultie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Keywords: Succession System, Taizong, Shizu, Prince Hoang, Cui Hao, Zhengping Incident

* Lo, Wen-hsi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at the Jen-Teh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壹、前言

拓跋政權立足中原後，面臨政治社會體轉型的大問題，解散部落即是首度推動的龐大改造工程。除此以外，君主繼承體制的改革攸關政權之穩定與傳衍，亦是至關重要。拓跋政權在建國前的繼承體制，整體而言並無定制，¹但是學界研究的論點各有所執，有持兄終弟及制者，²有以為從推薦制轉變為世襲制者等。³此外，亦有從歷程的角度，具體指出拓跋氏貴族、諸部落大人與母系部族等力量對繼承體制常發生重大的影響。⁴太祖拓跋珪（371-409）建國後，一般以為試圖將繼承體制扭轉為父子繼承制。太宗拓跋嗣（392-423）則新行太子監國制作為父子繼承制的轉型體制，世祖拓跋燾（408-452）亦仿行太子監國制進而實行父子繼承制。從太宗至世祖朝看似穩定朝父子繼承制發展，但究之史實恐非如此。

繼承體制牽涉頗多層面，包括太子與生母的定位角色，當代人的認知觀念，政治局勢的推演，以及東宮體制的發展等，各層面彼此牽連互動密切，本文試從這些層面來具體探究太宗、世祖朝繼承體制演變之意義。過去的研究多立於「太子監國」的問題意識來開展探討與解釋，有以為世祖與恭宗拓跋晃（428-451）理念衝突者（如川本芳昭），有以為軍事與行政分工趨勢而引起衝突者（李憑），或強調太子監國之權力狀態者（溼添慶文）等。⁵本文在前賢既有研究基礎的指引下，擬對此議題的空白處，如恭宗的出生與生母賀氏（？-428）的背景，與政治局勢的脈絡關係，以

¹ 孫同勳，《拓跋氏的漢化及其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29：「拓跋氏的繼承本無定制，而是由部落大人於君主本系中選擇擁立。」王吉林，〈北魏繼承制度與宮闈鬥爭之綜合研究〉，《華岡文科學報》，第11期（1978），頁94，王吉林亦以為部落聯盟時期的繼承制度並無定制。

² 韓國磐，《北朝經濟史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3-5，韓國磐以為在拓跋什翼犍以前，主要以兄終弟及的繼承為主。王仲華，《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514，王仲華也以為自拓跋詰汾以下至拓跋珪為兄終弟及制等。

³ 船木勝馬，《古代遊牧騎馬民の国—草原から中原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9），頁200。

⁴ 李明仁，〈鮮卑拓跋氏君主繼承制研究〉，《興大人文學報》，第34期（2004），頁631-672。

⁵ 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兩朝的世子監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頁28-35；川本芳昭，〈景穆太子と崔浩〉，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103-123；李憑，《北魏平城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20-137；溼添慶文，〈北魏の太子監國制度〉，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187-206，後來發表〈關於北魏的太子監國〉，收入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85-97。溼添慶文，《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最近已翻譯中文本（趙立新等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及東宮的建置與發展情勢等層面再作探索，希冀對議題產生更完整的理解。《魏書》受限於時代限制，頗多簡略或隱晦之處，本文試圖以比較、綜合等方法來完成此一課題的補述性討論，希望可助益於此一領域的研究推進。

貳、太子拓跋晃的出生與生母賀氏

太宗、世祖朝的繼承問題頗為複雜，在不同時序涉及不同層面的問題。今先討論繼承問題的源頭，繼承人太子之出生與生母的關係。比較起來恭宗與生母賀氏的情況，頗不同於太宗與世祖時的情況，故由此開始討論以逐步揭露出相關的繼承問題。

微觀於諸帝出生的情形，有助於理解北魏前期的繼承問題。恭宗生於神䴥元年（428），《魏書·世祖紀》僅載「是歲，皇子晃生」，後來的史籍《北史》與《資治通鑑》中無載。⁶ 另在《魏書·世祖紀附恭宗紀》有載：「（恭宗）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賀夫人。延和元年（432）春正月丙午（一日），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世祖甚奇之。」⁷ 這是唯一輔理解恭宗出生時情形的史料，但僅知他是長子與生母是賀夫人，其餘記載則是後來成長過程中受到世祖的期待。

比對於前朝太宗、世祖出生時的情形。太宗於登國七年（392）生，《魏書·太祖紀》雖僅載「是歲，皇子嗣生」，⁸但是，在《魏書·太宗紀》有載：「太祖晚有子，聞而大悅，乃大赦天下。」⁹ 在《北史》中亦有相關記載。世祖於天賜五年（408）出生，《魏書·太祖紀》亦僅載「是歲，皇孫燾生」，¹⁰但是，在《魏書·世祖紀》有載：「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

⁶ （北齊）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80），卷4上，〈世祖紀上〉，頁74。

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附恭宗紀〉，頁107。

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2，〈太祖紀〉，頁25。

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49。

¹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2，〈太祖紀〉，頁44。

¹¹ 雖然當時太宗尚在東宮，但世祖之出生亦受到重視，且太祖立刻向其兄弟宣示。

¹² 在《北史》中亦有類似的記載。即使再比對於後來高宗（440-465）的出生，也是類似於太宗、世祖的出生情形。¹³

史籍記載詳略不一本屬自然，但，上述的線索亦有一定意義，可嘗試追索。暫不論當時的繼承體制為何，皇子的出生畢竟緊密關係著繼承人選的問題，所以自然會受到關注。然而，恭宗出生受關注的情形便不如太宗、世祖或高宗。所以，若就此細微環節來看，或許凸顯出世祖時期繼承人選存在著問題。或進一步推論之，當時對繼承人選與繼承體制需獲得皇帝與勳貴大臣的共識。

對於上述出生的現象，本文根據相關聯的線索試圖理解這個問題。在世祖弟樂安王範（？-447）之子身上見及：「（樂安王範）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¹⁴ 世祖至二十一歲（神䴥元年，428）恭宗始出生，如同太祖至二十三歲（登國七年，392）太宗始出生，當時，曾載「晚有子」。相較於太宗十七歲生子、恭宗十三歲生子與高宗十五歲生子，世祖與太祖都屬晚生子。所以，自然產生同輩兄弟先於皇帝生子的情況。此事如就中原漢式繼承原則（嫡長子繼承制）解析之，拓跋宗室兄弟所生子，不論早生或晚生於皇太子，皆無繼承資格也不影響繼承人選。然而，如就長子繼承制或就傳統兄終弟及制來說，強調的都是「年長」的原則，加上尚無明確「嫡」的概念。¹⁵ 所以，此時世祖「親撫養之」，便可能凸顯出此時存在的繼承問題。

假設此時繼承體制的演進狀態，兄終弟及制與長子繼承制甚至推選制交相並存。在如此的制度與文化條件下，同一輩分兄弟最早生子而成為年長者，便極有可能仍被視為具有繼承資格，這個沿續傳統的想法恐怕依舊存在。¹⁶ 所以，世祖已在帝位

¹¹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69。

¹² （北齊）魏收，《魏書》，卷15，〈昭成子孫列傳·秦明王傳附〉，頁371：「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衛王）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

¹³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93：「（太平真君元年，440）六月丁丑，皇孫濬生，大赦，改年。」

¹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17，〈明元六王列傳·安定王傳〉，頁415。

¹⁵ 王吉林以為「北魏之立嗣，必擇長子，而無嫡庶之別」。見王吉林，〈北魏繼承制度與宮闈鬥爭之綜合研究〉，頁98。

¹⁶ 過去研究拓跋政權繼承制度，聚焦於從部落推選制與兄終弟及制推演至嫡長繼承制，但是，本文在此微

而尚未生子時，將弟之子視為己子而親撫養之，顯示世祖自身想法恐也深受部落傳統體制中年長概念的影響。另一可能，這樣的撫養亦是防範大臣將來擁護其為繼承人。若此的話，恰好從世祖身上反應出繼承制度之運行尚須防範類似傳統部落大人之推舉擁立的勢力。類似世祖養弟之子的案例也曾發生於太祖時，因太祖「晚有子」，故命衛王儀（？-409）之子拓跋纂（？-437）於宮中。¹⁷ 因此可見，北魏繼承制度之不易確立與傳統文化影響之深。

由此細節來回看恭宗的出生，蓋可確定時人及世祖可能都深受傳統觀念影響，都尚未形成共識認同於長子繼承制或者嫡長子繼承制。所以，綜合這些狀態來看，正反映出恭宗出生於一個繼承體制與概念並不明確，且尚未與大環境協調適應的混雜情境。

除了繼承角度的解析之外，尚可從生母及其家屬背景角度來看。觀察太宗、世祖與高宗的生母背景，¹⁸他們與北魏政權之關係，有同一陣營而聯姻者（太宗母），有以選制入宮而關係近密者（世祖母），有以歸降而被選入者（高祖母）。總之，他們的生母及其家屬都是與北魏政權關係明確而良好者，並未存在著負面性（對抗或反叛）因素。

至於恭宗生母的背景：「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為夫人，生恭宗。神䴥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諡，配饗太廟。」¹⁹ 恭宗生母資料頗為簡略，可找到的相關資料有〈賀迷傳〉。²⁰ 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來看，可

觀的討論中發現，年長的概念在部落推選制與兄終弟及制的演進過程中，是一被認可的重要原則。兄終弟及制的年長概念在南安王余被宗愛立為皇帝時依然可見，《魏書》，卷 18，〈太武五王列傳·南安王傳〉，頁 434：「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眾。」「非次」即未依年齡順序，或說未依兄終弟及制原則。因此，世祖雖以長子身分繼承帝位，但在其帝位時期，依舊可見傳統的概念強過於嫡長繼承制的概念，所以，此時拓跋政權的繼承制度恐仍是處於渾沌不明確的狀態。

¹⁷（北齊）魏收，《魏書》，卷 15，〈昭成子孫列傳·秦明王傳附〉，頁 372：「（衛王儀）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

¹⁸（北齊）魏收，《魏書》，卷 13，〈皇后列傳·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傳〉，頁 325：「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為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皇后列傳·明元密皇后杜氏傳〉，頁 326：「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皇后列傳·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傳〉，頁 327：「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真君元年，生高宗。」

¹⁹（北齊）魏收，《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太武敬哀皇后賀氏傳〉，頁 327。

²⁰（北齊）魏收，《魏書》，卷 83 上，〈外戚列傳上·賀迷傳〉，頁 1816：「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

能生母賀氏這一支系經解散部落與清河王紹事件以後殘留勢力不多，但不能排除賀氏其他的潛藏勢力。且，北魏皇室之聯姻對象向來都有政治性因素考量，世祖為何納入賀氏已無從得知，但應是有所考量，如同納赫連氏一樣（拉攏安撫之）。²¹ 再考察賀氏的相關資料有〈尒朱榮傳〉。²² 尒朱氏世代相承為領民酋長，並未被解散部落而保有戰鬥力，以「敬哀皇后之舅」的外戚身分而從世祖征伐有功。因此，可能因這些條件遂納入賀氏。但是，畢竟尒朱氏是長期處於周邊地區的從征勢力，並非拓跋政權能全盤掌握，又賀氏曾經背叛於拓跋政權，因此，本文研判這些背景因素影響恭宗初生時的角色地位。

接著，再觀察恭宗生母賀氏的角色地位。若由上述勾勒出賀氏的家庭背景來看，她在恭宗出生的神䴥元年即薨，給予我們頗多的想像空間。當然，她可能因難產或遭後宮殘害等因素而死。然而，尚有更可能的狀況：為「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²³太祖創立「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的慣例。²⁴ 太宗雖是第一個遭受此一「故事」的受害者，但，他更是延續此一慣例的徹底實踐者。²⁵ 就國家社會整體發展來說，這是一個轉型為專制君主國家體制的殘酷辦法。²⁶ 由此角度來看恭宗生母賀氏的背景及其遭遇，便能理解世祖頗為繼承體制作防範措施。

再就慣例的「將為儲貳」之意來說，意謂此子未來將為皇太子進而繼承帝位。太宗生母即是在太祖末年「以舊法薨」，世祖生母也在世祖即位（泰常八年，423）前的「泰常五年（420）薨」，亦即兩人皆已被視為繼承人。²⁷ 因此，恭宗生母於「神䴥元年薨」，應該是遵行這個「故事」、「舊法」。然而，世祖此時是否認定恭宗為繼

²¹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太武皇后赫連氏傳〉，頁327：「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²² （北齊）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1643：「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為氏焉。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

²³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49。

²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傳〉，頁325。關於太祖創立之事，詳見蔡幸娟，〈北魏立后立嗣故事與制度研究〉，《成大歷史學報》，第16期（1990），頁262-266。

²⁵ 蔡幸娟，〈北魏立后立嗣故事與制度研究〉，頁266-269。太宗在泰常五年（420）不僅賜死世祖生母密皇后杜氏，連未生子而深受寵愛的昭哀皇后姚氏也一併賜死。

²⁶ 田餘慶，〈北魏後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收入氏著，《拓跋史探》（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9-61。

²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傳〉，頁325。

承人無法確證。但是，我們知道太祖創「故事」、「舊法」與太宗徹底實踐，皆是世祖所熟知的。若由此家傳宗法來看賀氏的遭遇，顯得世祖之作為匆促而非按照舊有慣例體制。

順此論述線索再作觀察，討論賀氏「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與「後追加號諡，配饗太廟」之事。先說賀氏神䴥元年薨即「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一事。事實上，距此八年前的泰常五年，太宗已先對世祖生母杜氏（？-420）實施「諡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一樣的事，世祖後行仿效便不足為奇。²⁸ 而且，後來至延和元年（432）正月恭宗被立為皇太子以後，三月「追贈夫人賀氏為皇后」。²⁹ 由此可見，世祖對賀氏的封號是對其地位的肯定，也是對恭宗立為皇太子的對等回應。

再論「後追加號諡，配饗太廟」一事。自太祖創「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後來，太宗在即位時即追尊生母號諡並配饗太廟，意謂於宗廟中有位次、地位被列入皇室，可謂母以子貴。因此，太宗開始訂下規則，「自此後宮人為帝母，皆正位配饗焉」。³⁰ 即所生子已經即位為「帝」，母親才能「正位配饗」具有在宗廟中的地位。

這個帝母配饗辦法自太祖時期開始建立，藉此建立出拓跋宗室完整的祖先祭祀體系。³¹ 根據帝母配饗規則，後來諸皇后的追尊號諡與配饗太廟都是在所生子即帝位後才進行。包括前述太宗生母道武宣穆皇后劉氏（？-409）、³²世祖生母明元密皇后杜氏、³³高宗生母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452）、³⁴顯祖生母文成元皇后李氏（？

²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明元密皇后杜氏傳〉，頁326。

²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80。

³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傳〉，頁325。

³¹ 天興二年（399）十月宗廟完成，然後，《魏書》，卷2，〈太祖紀〉，頁36：「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稍後，太祖追祀平文皇后王氏、昭成皇后慕容氏、獻明皇后賀氏配饗太廟，以示尊崇。

³²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傳〉，頁325：「太宗即位，追尊號諡，配饗太廟。」

³³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明元密皇后杜氏傳〉，頁326：「世祖即位，追尊號諡，配饗太廟。」

³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傳〉，頁327：「高宗即位，追尊號諡。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456)。³⁵高祖生母獻文思皇后李氏(?-469)、³⁶世宗生母孝文昭皇后高氏(?-495)等。³⁷至於肅宗生母宣武靈皇后胡氏(?-528)已無按故事賜死，且還臨朝聽政與肅宗同時並存，故無「追加號諡，配饗太廟」的事實。

上述所舉較穩定時期諸帝生母配饗太廟的情形，可見自太宗開始「宮人為帝母，皆正位配饗」的規則得到歷代落實。這不僅代表著諸位「帝母」地位之被承認，更重要背後代表著諸位皇帝的合法性與穩定傳承。但是，上述諸帝生母中唯獨無列恭宗生母，因〈太武敬哀皇后賀氏傳〉無確切時間記載。以下試加以論證。

如依據帝母配饗辦法的原則，恭宗未即位而死，有可能對賀氏「追加號諡，配饗太廟」者有南安王拓跋余(?-452)或高宗。可是，在兩人的相關紀錄中皆無載此事。尤其，高宗初即位便追尊恭宗為景穆皇帝，若此時恭宗生母賀氏尚未被尊號諡，於理直系孫輩的高宗更須一併追尊號諡。若有此事，於高宗身分背景實屬重要，理應會記載。因此，若無這個可能性，必須思考另外的可能性。

前說世祖於神䴥元年追贈賀氏為貴嬪，是仿行太宗對世祖生母杜氏實施追諡密貴嬪，可見太宗之作為對世祖影響性頗高。那麼，對賀氏「追加號諡」有無世祖所為之可能？就太宗所為，也曾對未生子但寵幸的姚氏(?-420)賜死後，「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後加諡（昭哀皇后）焉」。³⁸就帝母配饗辦法而言，例外性在於未生子但得到號諡。由此可見，太宗亦有任意自為不遵規則的一面。所以，當賀氏在延和元年被迫贈為皇后之後，亦有可能世祖予以「追加號諡，配饗太廟」。世祖不遵慣例已於前面論及，對於內宮其他皇后、太后亦是如此，故學者以君權的角度加以詮釋。³⁹

綜論之，太祖、太宗是繼承體制的主要創建規劃者；但，太宗與世祖又是破壞

³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文成元皇后李氏傳〉，頁331：「太安二年（立顯祖為太子）……薨。後諡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對照於《魏書》，卷6，〈顯祖紀〉，頁126所載，應該是天安元年（466）乙渾事件過後，三月「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時完成皇后的配饗太廟。

³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獻文思皇后李氏傳〉，頁331：「承明元年（顯祖崩）追崇號諡，配饗太廟。」

³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孝文昭皇后高氏傳〉，頁335：「世宗踐祚，追尊配饗。」

³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傳〉，頁325。

³⁹ 張繼昊亦論及世祖對密皇后與保太后之措施，有違禮制與慣例，彰顯其君權之任意擅為。見張繼昊，〈從數件史事論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的君權〉，《空大人學報》，第11期（2002），頁84-92。

慣例的始作俑者，尤其世祖似乎頗受太宗影響而更甚之。從考察恭宗的出生與對待賀氏的措施中，可見及此時拓跋政權繼承問題充滿複雜性與不確定性，對於繼承人尚未有共識且受到傳統文化之影響。此節雖是細部微觀的討論，但可以視為北魏政治社會體發展轉型的縮影。

參、太宗、世祖朝繼承體制的推演

上述對恭宗及其生母賀氏的初步討論，已觀察到繼承問題中的複雜性。接著，上溯觀察太宗、世祖期間的繼承問題。此時繼承問題多聚焦於太子監國制度，首先實施於太宗明元帝朝，世祖是首位太子監國制度的當事人。⁴⁰ 泰常七年（422）五月世祖被立為皇太子，隨即臨朝聽政監國，隔年（泰常八年，423）十一月便即皇帝位。⁴¹ 前後短暫一年多的時間中，世祖首次行使太子監國是在複雜的形勢及各方力量交匯下而前進。問題試從太宗與崔浩（？-450）的問答看起：

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崔）浩曰：「……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叡溫和，眾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⁴²

這段對話出現的時間約在泰常四年（419），當時太宗已經即位十一年，年紀二十七

⁴⁰ 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兩朝的世子監國〉，頁 28。

⁴¹ 李憑已經論證世祖之身分確為皇太子，詳見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 76-87。

⁴²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2-813。

歲，因疾而擔憂未來繼承人的問題。⁴³ 太宗所謂「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可稍加以分說。當時，長子世祖十二歲，相較於太宗十八歲即位確屬年少。可是，若太宗有長子繼承的想法，似不應有「諸子並少」的考量。可是，檢視太宗其他諸子的狀況，或可理解太宗當時的想法。⁴⁴ 所以，太宗思考未來繼承人問題時，是尚處於猶疑狀態而未決定。崔浩識穿太宗的想法，故回應「若須並待成人而擇」以點破之。因此，起初太宗並未確立繼承人之人選。

先前，太祖末年（天賜六年，409）政情正紛亂時，太祖其實執行了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企圖建立父子繼承制。不僅在八月誅殺謀奪帝位的衛王儀，同時還為防止母后勢力遂殘忍的實施子貴母死制，然而，太宗一時未能理解接受而逃竄於外。結果，不僅父子繼承制未實踐，而且自己死於次子清河王紹（393-409）的政變。因此，北魏政權第一次的轉移是失敗的。由清河王紹憑藉生母賀氏背後勢力發動政變來看，可見傳統母系勢力依舊興盛。事件發生不久，太宗憑藉著鮮卑貴族勢力的支持而奪回帝位。但是，這個過程是父子繼承制失敗而造成的政爭而不是長子繼承制的落實。由結果來看，凸顯出鮮卑貴族勢力的支持才是帝權穩定的重要基礎。

因此，太宗即位後多以長孫嵩（358-437）、安同（？-429）、奚斤（369-448）等出任王公大臣並擔負政軍要務，這是一種合乎現實權勢的務實作法。待約至泰常四年太宗遣人私下密問崔浩「圖後之計」，考慮到未來傳承帝位問題時，便須處理舊有各方勢力始能穩定帝位之傳承。

崔浩是經歷太祖、太宗與世祖三朝的重臣，頗了解北魏建國以來的政情發展。他的回應便剖析當時的情勢要點：

第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指拓跋政權自太祖建立以來至太宗後期，不夠重視儲君的角色地位及相關措施。這些應是整套的體制，但核之於當時的史實，僅就名稱來看便不夠明確、尊顯。例如太祖在天興六年（403，太宗 12 歲）十月時，

⁴³ 周一良，〈年漸一周〉，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41。

⁴⁴ （北齊）魏收，卷 17，〈明元六王列傳·樂平王丕傳〉，頁 413：「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尤其是樂平王丕，顯見太宗極為賞識樂平王。而且，「以丕長」可能是世祖以外最年長，甚至亦有可能年長於世祖，因其他諸子生卒年無載而無法判定。或者還有其他原因，使太宗遲未確立世祖為繼承人，故考量「諸子並少」。

「立皇子嗣為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⁴⁵ 且，當時太宗是與其他諸王同時並立，⁴⁶未顯現出尊貴地位。此種與諸王同時封立的情形，至太宗封立世祖時依然相同，直至世祖時期以後，始單獨優先封立恭宗且明確記載「皇太子」。⁴⁷ 所以，單就封立皇太子的形式、名稱來說，崔浩稱之「不崇儲貳」是符合實情的。

第二，「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這是根據前因「不崇儲貳」之勢所造成「履霜堅冰之禍」的結果。「社稷幾危」應是指危及繼承制度的清河王紹事件，⁴⁸關於這一情勢，曹文柱先生以「氏族舊制的遺留」觀點剖釋之。⁴⁹ 本文以為，從事件過程中反映出此時皇位繼承制度仍不明確與尚未成型，又可見及母系部落力量之影響等。由此可見，太祖以後至太宗時期繼承體制之推演，受到觀念、制度及各種外在勢力的阻礙。當時，世祖便是在如此時代背景中被立為皇太子以及即帝位，內外皆有不明確的因素條件。

第三，早建東宮，簡選師傅賓友，輔佐太子熟悉內外政軍事務。此處所指「早建東宮」並非僅指立皇太子而已，更需建置整個東宮體制之人員（此點於後再論），尤其是太子近身輔佐的師傅賓友更為重要。且，崔浩提出一重要原則「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由此皇帝可以確保掌控皇太子繼承皇位與領導國家政務。當時，太宗遂由此布局皇位的傳承，⁵⁰後來世祖也遵照此一原

⁴⁵（北齊）魏收，《魏書》，卷2，〈太祖紀〉，頁41。

⁴⁶（北齊）魏收，《魏書》，卷2，〈太祖紀〉，頁41：「紹為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變為豫章王，陳留王子右將軍悅為朱提王。」

⁴⁷（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1-62：「（泰常七年，422）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為泰平王，燾，字佛瑩，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為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為樂安王，加中軍大將軍；健為永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為建寧王，加輔國大將軍；俊為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子嵇敬，封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泰平王攝政。」由此引文亦可證明，「封皇子燾為泰平王」即是皇太子，與太祖「立皇子嗣為齊王」是一樣的。比較兩例與其他諸王的封立，最大的不同在於僅有「相國」一職，可是這畢竟與「皇太子」職稱不同。

⁴⁸（北齊）魏收，《魏書》，卷16，〈道武七王列傳·清河王紹傳〉，頁390：「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

⁴⁹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兩朝的世子監國〉，頁29-30。

⁵⁰（北齊）魏收，《魏書》，卷35，〈崔浩傳〉，頁813：「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

則布局。⁵¹

第四，實施監國制度「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以使皇權順利轉移。簡言之，使皇太子開始練習執掌軍國大政，以便熟悉順利進入狀況。更重要者，在使皇權帝位不再發生先前的危機而安全的傳於子。因此，李憑先生視之為「皇權的輔助方式」以及「除卻兄終弟及遺制的影響」。⁵²

但是，崔浩提出監國制度建議後，並非是立即「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事實上，最後關鍵決定的人物仍是鮮卑貴族代表之長孫嵩。⁵³直至泰常七年（422）長孫嵩的表態支持才「定策禁中」。當時，兩位漢胡族群代表之崔浩與長孫嵩，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年長」原則，一說「立子以長」，一說「立長則順」，可見「年長」原則是當時最主要的考量。

依此原則來檢視，約從泰常四年崔浩建議到泰常七年長孫嵩的表態支持，這期間的發展是值得關注的。如果說為了使皇位穩定安全的傳承於子，即落實長子繼承制，則必須去除可能具有威脅勢力的人物，在隔年（泰常五年，420）以後的發展有著這樣的趨勢，包括明元密皇后杜氏、⁵⁴陰平王烈（？-420）、陽平王熙（399-421）與河南王曜（401-422）等人相繼的死亡。⁵⁵若說以上諸人的死亡都是自然，恐過於巧合。尤其，陽平王熙與河南王曜皆是太宗較年長之弟，兩人皆勇壯且有帶兵作戰的經驗，竟分別於二十三、二十二歲亡，實令人懷疑。⁵⁶因此，崔浩理想的力推長子繼承制，現實上太宗則著力於防堵傳統勢力以穩定長子繼承制。可想而知，在繼承體制不穩定的情況下，又面對傳統勢力之威脅，太宗似也不得不如此強勢而為。

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

⁵¹（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96-97：「（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

⁵²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75-76。

⁵³（北齊）魏收，《魏書》，卷25，〈長孫嵩傳〉，頁644：「太宗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為左輔。」

⁵⁴（北齊）魏收，《魏書》，卷13，〈皇后列傳·明元密皇后杜氏傳〉，頁326：「明元密皇后杜氏，……生世祖。……泰常五年（420）薨，諡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

⁵⁵（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0-61：「（泰常五年）閏（八）月甲午，陰平王烈薨。……（泰常六年，421）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泰常七年，422）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

⁵⁶李憑視之為「宗室之間皇位之爭的危險仍然存在著」。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114-115。

歷史的演進總是複雜緩慢，且時而前進時而後退，尤其涉及權力結構之時。前說泰常七年四月封立長子世祖時，同時間也封拜太宗其他諸子等，並未特出獨立封拜皇太子。尤其，還封拜太宗姐獻懷長公主（應是華陰公主，生卒年不詳）子嵇敬（生卒年不詳）為王。⁵⁷ 如就〈前職令〉的將軍位階來看，嵇敬之「大司馬、大將軍」更高於世祖的「大將軍」，彰顯出當時拉攏歸降紇奚部落與平定清河王紹事件的重要。至五月始明確公布「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泰平王攝政」。由此短暫處理過程來看，應非記載名稱的錯誤，而是在推進長子繼承制度時依舊小心謹慎。⁵⁸

世祖監國臨朝聽政以後，可見到太宗之積極安排使其準備繼承。首先，詔令執行傳統由皇帝親行的勸農田稼儀式：「（泰常七年九月），詔泰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⁵⁹ 很顯然，這個儀式主要在宣告世祖的繼承地位，故由其「率百國」以向歸降各方勢力展現準新君主之姿。接著，當十月太宗南巡以後：「十有一月，泰平王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安定王彌（?-424）與北新公安同居守。」⁶⁰ 即使不計太宗南討所率的軍隊，世祖所統的六軍應該也是國家重要的部隊，由世祖「親統」意在於奠定其軍事領導地位。至於安定王彌與太宗忠臣安同僅是「居守」，應非行使太子的監國之權。故當泰常八年（423）五月太宗南巡回至雁門時：「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⁶¹ 世祖的稱呼不僅不再稱「泰平王」而稱「皇太子」，更加明確他的地位。而且，「率留臺王公」便是世祖留臺行使監國之證據。

至七月時：「（太宗）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⁶² 此時，世祖所

⁵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34，〈嵇拔傳〉，頁804-805：「有嵇拔者，世為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眾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

⁵⁸ 李憑論及泰平王與皇太子名稱之使用，經諸文獻之比對，確認泰常七年（422）五月拓跋燾的身分是皇太子，部分文獻記載有脫誤。本文根據當時的情勢研判，另有一可能，即傳統部落勳貴力量仍強，在推進長子繼承制的過程中，可能曾遭其力量之反對，但為維持政權穩定又必須得其支持的情況下，以致前後出現拓跋燾身分名稱不一致的情況。拓跋燾監國以後，有四次重要行事紀錄，前二次稱「泰平王」，後二次稱「皇太子」。在這個過程中名稱的變化，恐即是反映出政權局勢之變化。由此角度的理解，便較能理解太宗私下密問崔浩，「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的擔憂情狀。見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76-87。

⁵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2。

⁶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2。

⁶¹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3。

⁶²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3。

率不僅是「留臺王公」而已，更是舉朝的「百官」，可見其已暫行皇帝的領導角色了。

由以上的行程可見，太宗對世祖監國之安排是細心、謹慎的，逐步向前推進邁向接掌政權，若說已經平穩建立起長子繼承制恐過於樂觀。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拓跋政權畢竟是以軍事武力起家的，依賴的是傳統貴族的力量。⁶³ 因此，太宗臨末仍不忘安頓鮮卑貴族以收其效忠之力。⁶⁴

以鮮卑貴族為基礎的基本格局是延續的，因此，世祖即位前期便是主要任用他們。⁶⁵ 且，當時正極力對外征討擴張，故都依賴代人武將，⁶⁶直到神䴥四年（431）漢人崔浩才出現於公卿大臣名單中。⁶⁷

肆、東宮的建置

延和元年正月立恭宗為皇太子，當時年僅五歲，比世祖十五歲時被立為皇太子年幼許多。回顧先前世祖出任太子監國時期的經驗，太宗必須考量諸多複雜形勢及勢力才逐步使其順利即位，又有世祖晚於兄弟生子等因素，所以，世祖立皇太子確立繼承人，自須衡量於形勢而因應之。

首先，正當世祖自身年富力強之時，便早立年僅五歲的恭宗為皇太子。這可能

⁶³ 曹文柱以為太宗「革於形勢，又設置了同樣地位很高、權限很大的輔弼機構，向享有特權的聯盟貴族讓步，以期為改革建立一個比較安定的客觀環境」。此點所言甚是，藉八大人官制將貴族勢力納入新制中。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兩朝的世子監國〉，頁31。

⁶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3，〈太宗紀〉，頁64：「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嵩已下至士卒各有差。」

⁶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69：「（泰常）八年十一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進司徒長孫嵩爵為北平王，司空奚斤為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為平陽王。」以及《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0：「（始光二年三月）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為太尉，平陽王長孫翰為司徒，宜城王奚斤為司空。」

⁶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2：「（始光四年）是月（四月），治兵講武，分諸軍，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太僕兵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步兵三萬部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為前候。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

⁶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9：「（九月），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

與世祖自身被晚立為皇太子的經驗有關，藉此及早確立繼承人以宣示繼承體制穩定。其次，世祖不再如太宗一樣將太子與其他諸皇子同時封立，而是單獨立恭宗為皇太子，儀式名稱上顯有區別，不再是崔浩所說的「不崇儲貳」的舊習。除此以外，先前本文開頭曾觀察到當恭宗被立為皇太子以後，生母賀氏即可能被違禮自為的世祖「追加號諡，配饗太廟」，以確立其在拓跋宗室的地位。若並觀此舉在母子雙方的影響，更主要的用意恐在於宣示繼承人之確立。

就立皇太子的儀式來看，可知世祖是相當著力於恭宗角色地位的經營，也是世祖為拓跋政權之延續與穩固的經營。在現實面上，年僅五歲成為皇太子，可以想見各方面能力皆屬童稚，尚無主政能力，可是該年六月至十一月：「（延和元年六月，432）世祖東征和龍，詔恭宗錄尚書事。」⁶⁸ 錄尚書事的工作是「位總阿衡」，總領行政之首。⁶⁹ 相信對年僅五歲的恭宗而言，尚無能力駕馭這項龐雜綜成的工作，應該是由公卿大臣輔佐之。⁷⁰ 但是，皇太子任「錄尚書事」一職在北魏歷史上極為少見。就當時情勢來觀察，⁷¹ 應該是世祖統治策略的展現，因皇權與功勳大臣產生衝突時而浮顯。所以，恭宗初立為皇太子便與北魏之政情局勢緊密相連。

再者，世祖對東宮之重視於下以措施可見：「是月（延和元年七月），築東宮。」⁷²、「（延和三年七月，434），東宮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⁷³ 原來的東宮於始光二年（425）已為世祖所改建他途，在立皇太子後立即建築東宮，歷時三年而

⁶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附恭宗紀〉，頁107-108。

⁶⁹ 嚴耕望，〈北魏尚書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1948），頁259-263。後來，《魏書》，卷27，〈穆崇傳附〉，頁670：「高祖南伐，以（穆）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穆亮應該即是為高祖託付總領行政之首。

⁷⁰ 因不知誰隨從出征，故當時輔佐恭宗的有可能是太尉長孫嵩、司徒崔浩與司空長孫道生等，此外亦有可能保太后也參與。

⁷¹ 當時，擔任尚書職官者有尚書令劉潔、尚書左僕射安原。兩人雖是功勳之臣，但是已經先在政軍大略上與世祖相左產生衝突。《魏書》，卷28，〈劉潔傳〉，頁687：「後大議征討，（劉）潔言宜先平馮跋，世祖不從。敕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後，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悅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可以想見關於敕勒新民之處理結果，必定令世祖強烈不滿。軍將不遵從皇帝之指揮而敢「固執」已見，可能是傳統部落領袖群之共議制使其權勢仍高，或是中央對軍隊之指揮無法完全掌控，以致軍將敢擅行己意。這種局勢對皇帝而言，可能短期無法解決，但確是統治上的危機。對此政治形勢的細部觀察，可窺知北魏政治文化仍帶有傳統部落大人的痕跡。

⁷²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81。

⁷³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84。

成，宮殿規模應該不小。而且，配置皇帝西宮屯衛士兵三分之一的數量。因此，從建築到士兵的規模數量來看，應該編入東宮內的人員應該不會太少。總括來看，從延和元年正月立恭宗為皇太子開始，隨後各項編制應該也是陸續完成，遂有東宮建築之完成。

事實上，恭宗東宮之建置最重要者在於人員的編制，可分為一般幕僚人員與輔政大臣，先論一般幕僚人員，輔政大臣於後再論。先從位階較高的太子太保看起，有薛提（？-452）：「薛提，太原人也。……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⁷⁴ 薛提應是歸降加入拓跋政權而非代人胡族，他是忠誠且有功勳的臣僚，故曾被世祖任命為太子太保。⁷⁵

此外，尚有代人豆代田（？-453）：

豆代田，代人也。……從討赫連昌，……後從駕平昌，……神麇中，討蠕蠕，……從討平涼，……從討和龍……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公，加平東將軍。從駕南討。轉太子太保。⁷⁶

相較於薛提，除了共同的忠誠因素以外，豆代田也非胡族勳貴而是傳統代人武將出身而屢有功勳的將領，故於世祖末期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九月南討時轉任太子太保。

位階次高的太子少傅有屈垣（389-443）：

屈遵，……（自慕容氏）歸太祖。……子（屈）須，……須長子（屈）垣，字長生，沉深有局量。……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恭宗在東宮（延和元年），垣領太子少傅。……垣在宮（東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⁷⁷

⁷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33，〈薛提傳〉，頁795。

⁷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33，〈薛提傳〉，頁795。薛提在宗愛事件中，曾擁立高宗：「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據此，蓋可推論其所任太子太保應是恭宗時期。

⁷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30，〈豆代田傳〉，頁727。

⁷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33，〈屈遵傳〉，頁777。

屈家自太祖以下至世祖時期，歷經祖父、父親及屈垣三代都與北魏政權維持良好關係，尤其，至世祖時期屈垣更受信任與重用。屈垣領太子少傅，從時間上推斷可能是延和元年剛立皇太子成立東宮體制時。顯然地，屈垣在東宮的表現「內外稱其平當」是很重要的關鍵。所以，後來世祖自己出征時，都委以原來太子應該擔任的監國工作「居中留鎮」，此時應該主要是由屈垣輔佐。因此，顯然屈垣在東宮表現「內外稱其平當」，是符合世祖的期待，也是能達成世祖的任務要求。「內」應該是指東宮內部事務，「外」應該是指與皇帝及其他領域的關係。雖無法得知所謂「內外稱其平當」的詳情，但是，可知世祖從一開始立皇太子便很關注東宮的管理經營，所以，都派遣寵信大臣來管理。而且，世祖透過這些任於東西宮的幕僚，得以掌控東宮狀況及國政事務。

接著觀察游雅（?-461）：

游雅，……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⁷⁸

游雅與高允（390-487）同在神䴥四年（431）被徵入仕於北魏中央，隨即被任命為東宮內侍長。對照於延和元年正月立恭宗為皇太子，所以，極可能游雅便是東宮剛成立時的東宮內侍長，應該是負責東宮內部事務的總長。身分相較於屈垣，屈垣只是歸降入國者的後代，更非傳統的鮮卑貴族，游雅是出身傳統漢人士族的背景。因此，可見世祖安排近身輔佐太子的幕僚並無鮮卑貴族。

後來，游雅再任職東宮「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可注意的是，游雅所領的禁兵可能是戍守東宮的禁兵，此職較為重要，故給予游雅升爵加將軍號。由此可見，游雅此時所任太子少傅的職權比屈垣之時可能更為重要，應有守衛、輔佐及保護的用意。游雅任此職的時間，據史料的推估約從439年至451年，任職時間達十三年之久。⁷⁹由此長期穩定的任命來看，當然可視為世祖希望游

⁷⁸（北齊）魏收，《魏書》，卷54，〈游雅傳〉，頁1195。

⁷⁹（北齊）魏收，《魏書》，卷38，〈王慧龍傳〉，頁877所載，在太平真君元年（440）以前，「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又《魏書》，卷48，〈高允傳〉，頁1068所載，太延五年（439）世祖詔高允與崔浩述成《國記》，崔浩與高允討論曆法時，「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由此二點推論來看，游雅可能自太延五年（439）起開始擔任太子少傅。此外，據《魏書》，卷

雅輔佐好恭宗，游雅代表世祖對東宮監管與保護。至正平事變發生前數日，⁸⁰世祖還「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可見世祖雖任用游雅為太子少傅，但同時也是其所任用操控的臣僚。

在太延五年（439）恭宗監國以後，擔任教授工作最著名的應該是高允：「（太平真君三年十月以後，442）（高允）以本官為秦王翰（？-452）傳。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⁸¹ 所以，高允之教授恭宗經書，是稍晚於太平真君三年以後，即恭宗十五歲以後。而且，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事件發生時，這期間未見高允擔任其他職官，事發當時恭宗曾言，「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或如高允所言，「臣侍講日久」。⁸² 可見，高允教授恭宗經書時間長達約八年的時間。

由時間長度來看，世祖交付予高允在東宮教授是重要的職務。再對照上述游雅任職東宮太子少傅約從 439 年至 451 年，時間長達十三年。因此，游雅與高允可能就是世祖安排於東宮任職主要的漢人士族。他們的角色除了教育、輔佐以外，應該還包括東宮內部的事務。

此外，上述引文「（高允）以本官為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一事，可再討論。高允的本官是中書侍郎，據〈前職令〉官品為四品上。約太平真君三年以後擔任「秦王翰傳」，這個「傳」，對照於〈東平王翰傳〉，「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⁸³ 於理，這個「太傅」應該是東宮三師的「太子太傅」而非三師的「太傅」，故官品為從一品上。「太子太傅」應該是高允的兼職，⁸⁴非其本官，是世祖所派任者。「太子太傅」是文獻所見官品最高的東宮職官，雖與「太子太保」同職等但位階更前。

111，〈刑罰志〉，頁 2874 所載「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444），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太子）少傅游雅上疏」以及《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頁 105 所載：「（正平元年六月，451）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內容與上述〈游雅傳〉引文相同，且時間僅在太子晃六月薨之前不久。所以，游雅直到正平元年（451）以前仍擔任太子少傅，任職時間至少達 13 年之久。

⁸⁰ 「正平事變」一詞，採用李憑先生的研究，詳見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 120。

⁸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高允傳〉，頁 1069。可確定時間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十月以後，因為拓跋翰封王時間從此開始，見於《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頁 95。

⁸²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高允傳〉，頁 1070。

⁸³ （北齊）魏收，《魏書》，卷 18，〈太武五王列傳·東平王翰傳〉，頁 418。

⁸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高允傳〉，頁 1076：「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431-457）不徙官。」

高允既為「太子太傅」，卻先「為秦王翰傅」，後來，再「敕以經授恭宗」，且可能高允同時任職於兩邊。此點是微妙而特殊的，即可能是世祖所處心經營者。高允所作〈諸侯箴〉今天已不可知，但從標題意義可知，意在曉諭秦王翰需居於諸侯的角色。再者，查證高允先前的經歷可知，曾擔任世祖舅陽平王杜超（？-444）、世祖弟樂安王範（？-447）之從事中郎與參世祖弟樂平王軍事。⁸⁵ 因此可知，對諸王與太子的輔佐教導上，世祖頗為器重高允所扮演的角色。

觀察上述較重要輔佐東宮的薛提、豆代田、屈垣、游雅與高允的人事案，可知世祖對於恭宗在各方面是處心經營與掌控，方法主要是透過忠誠受信任的大臣官僚奔走於兩宮之間而達成。如上述與屈垣同受寵待的盧魯元家也是類此，盧魯元（？-442）自世祖監國時期以後便受到優於鮮卑貴族的寵任「貴異」，⁸⁶故其兩子皆被世祖任命於東宮：「少子（盧）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盧）統以父任，侍東宮。」⁸⁷ 顯然，盧魯元兩子都是因其曾經給侍世祖獲信任，故同時任命兩子於東宮。且，盧家亦是自慕容氏歸降入國者，並非傳統鮮卑貴族。

此外，東宮職官位階依序稍低的還有任「太子中庶子」的賈秀（397-469），⁸⁸「太子庶子」的王安都（生卒年不詳）與韓備（生卒年不詳），⁸⁹「太子洗馬」有崔蹟（生年不詳，太平真君初年卒）與羅敦（生卒年不詳），⁹⁰或稱「東宮洗馬」有孔羅漢（生卒年不詳），⁹¹以及擔任「主書」的游明根（419-499）、公孫叡（生卒年不詳）與韓麒麟（433-488）等。⁹² 所以，根據有限的文獻可知東宮各項職務的編制

⁸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高允傳〉，頁 1067-1068：「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

⁸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 34，〈盧魯元傳〉，頁 801：「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太宗時，選為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臥內。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

⁸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 34，〈盧魯元傳〉，頁 802。

⁸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33，〈賈彝傳〉，頁 792。

⁸⁹ 分別見於（北齊）魏收，《魏書》，卷 30，〈王建傳〉，頁 711 與《魏書》，卷 51，〈韓茂傳〉，頁 1128。

⁹⁰ 分別見於（北齊）魏收，《魏書》，卷 32，〈崔逞傳〉，頁 758 與《魏書》，卷 44，〈羅結傳〉，頁 988。

⁹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51，〈孔伯恭傳〉，頁 1140。

⁹² （北齊）魏收，《魏書》，卷 55，〈游明根傳〉，頁 1213：「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蟬，慕容熙

可能皆有數人。而且，東宮規模初始階段，對教育太子的工作是世祖頗為重視的，此點可由世祖尋訪邢穎「宜侍講東宮」可知。⁹³ 所以，由這些個案可推知，在太延五年恭宗監國以後，明確設有一批東宮的各類官吏幕僚，漢人主要擔任教育性工作，如後期的東宮博士管恬與東宮侍郎吳延等亦是。⁹⁴

至於其他記載較為簡略的東宮人員僅載「給事東宮」或「給侍東宮」，除了上述盧統、盧內兄弟以外，還有谷闡（？-474）、⁹⁵酈範（428-489）、⁹⁶李敷（？-470）、⁹⁷盧度世（419-471）、⁹⁸慕容白曜（？-470）等。⁹⁹

整體綜合來看，世祖任命東宮官僚的原則，有與世祖近親而受信任的孔羅漢；有因祖（谷渾）父（谷闡）先後給事東宮（世祖、恭宗）獲器重信任而使孫谷洪（生卒年不詳）再「入授高宗經」；¹⁰⁰ 有歸降歷經三代的仕宦信任使酈範「給事東宮」；¹⁰¹ 李敷先「給侍東宮」，後又「內參機密，出入詔命」為世祖所信用等。¹⁰² 由此可見，世祖於東宮用人安排之布局，顯為其所主導掌控，最主要者必須忠誠與受信任。

就史籍所見東宮一般幕僚人員，主要是歸降入國而受信任者與傳統漢族士人以及少數代人胡族，漢族士人主要擔任教育的工作。少數幾個臣僚是穩定長年任用的，如屈垣、游雅、高允等。而且，世祖通常也任用這些東宮臣僚於中央朝廷，藉此以

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432），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439），與公孫叡俱為主書。」。公孫叡見於《魏書》，卷 33，〈公孫表傳附〉，頁 785：「（公孫叡）初為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魏書》，卷 60，〈韓麒麟傳〉，頁 1331：「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珣，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

⁹³（北齊）魏收，《魏書》，卷 65，〈邢巒傳附〉，頁 1437：「（邢）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穎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

⁹⁴（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高允傳〉，頁 1069、1070。

⁹⁵（北齊）魏收，《魏書》，卷 33，〈谷渾傳〉，頁 781。

⁹⁶（北齊）魏收，《魏書》，卷 42，〈酈範傳〉，頁 949。

⁹⁷（北齊）魏收，《魏書》，卷 36，〈李順傳附〉，頁 833。

⁹⁸（北齊）魏收，《魏書》，卷 47，〈盧玄傳〉，頁 1045。

⁹⁹（北齊）魏收，《魏書》，卷 50，〈慕容白曜傳〉，頁 1116。

¹⁰⁰（北齊）魏收，《魏書》，卷 33，〈谷渾傳〉，頁 780-781：「谷渾，字元沖，昌黎人也。……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為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在官廉直，為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為外都大官。……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

¹⁰¹（北齊）魏收，《魏書》，卷 42，〈酈範傳〉，頁 949。

¹⁰²（北齊）魏收，《魏書》，卷 36，〈李順傳附〉，頁 833：「（李敷）真君二年（441），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盧）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

充分掌握東宮情勢與國政，可見世祖對東宮之經營頗為用心與謹慎。目前所見的一般幕僚人員，唯獨沒有傳統鮮卑勳貴。

若與先前的東宮建置相較，更能凸顯世祖時期東宮體制的差別。僅就文獻所見太宗為太子時的幕僚如王洛兒（？-413）、¹⁰³車路頭（？-421）等，¹⁰⁴並無東宮幕僚的職官名稱與職務，應是沿襲部落時期侍從遊獵的帳下帥而已，尚未出現漢式東宮體制的建置。至世祖為太子時的幕僚，就文獻所見有谷渾、¹⁰⁵盧魯元等，¹⁰⁶從谷渾「以選給事東宮」來看，此時的東宮建置可能初具規模與體制，至恭宗為皇太子以後，如上述所討論者可見東宮的建置更為完整與具備規模。

伍、東宮輔政大臣與崔浩

前述繼承體制一節，已論及鮮卑貴族為拓跋政權基礎的格局是延續的，因此，從太宗朝到世祖前期便是主要任用他們為輔政大臣，而崔浩是泰常七年五月世祖臨朝聽政時唯一出任輔政大臣的漢人。當時，其他的輔政大臣長孫嵩、奚斤、安同、穆觀（389-423）、丘堆（？-428）等皆是鮮卑貴族或功勳武將且助拓跋政權建國之功臣，由此可見，此時北魏政權中央之權力結構以代北胡人為主。代北胡人不僅是數量上的優勢，更有權勢上沿襲傳統的優勢。如長孫嵩是拓跋政權在建國前獻帝隣七分國人的宗族後裔，這樣傳統身分的影響力常因史籍記載的簡略而被忽略。他是決定世祖監國的重要關鍵，得到長孫嵩的支持，等同得到鮮卑貴族群之支持，政權才可能順利轉移。因此，傳統貴族之擁立推舉力量仍具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具有的

¹⁰³（北齊）魏收，《魏書》，卷34，〈王洛兒傳〉，頁799：「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澤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

¹⁰⁴（北齊）魏收，《魏書》，卷34，〈車路頭傳〉，頁800：「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

¹⁰⁵（北齊）魏收，《魏書》，卷33，〈谷渾傳〉，頁780-781：「太祖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

¹⁰⁶（北齊）魏收，《魏書》，卷34，〈盧魯元傳〉，頁801：「太宗時，選為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

勢力在拓跋政權內恐怕仍是皇權尚無法完全掌控、駕馭的。

如此的中央政權結構，可說就是鮮卑貴族幾近壟斷性的輔政格局。這樣的政局現況實有著複雜的歷史性因素，可由接續長孫嵩地位的穆氏之例得到相當的反映。¹⁰⁷ 穆氏即後來太和年間列入勳臣八姓的貴族，「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¹⁰⁸ 對拓跋政權而言，為延續穩定的組織結構、人事關係、集體記憶與情感延續，故以承襲爵位、聯姻關係與賜封職官等機制來結合各方之力量。尤其，通常甚早即以功臣之子為「內侍」，作為延續彼此結合的政治機制。此種「內侍」的對象，不是皇帝即是皇太子，顯現出與皇權之密切關係。

如此傳統形勢影響下的輔政結構，存有相當的妥協性。畢竟，鮮卑貴族仍是北魏政治社會體的領導群，故必須緊密連結他們。而且，不僅輔政大臣的掌管頗廣，如穆觀「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而且，非在世祖輔政大臣名單內之劉潔與古弼等雖僅選侍東宮（世祖），¹⁰⁹ 也能「對綜機要，敷奏百揆」掌管頗多。¹¹⁰ 如此，輔政中央與東宮之群僚，目前所見以勳貴大臣為主。

儘管鮮卑貴族佔有朝政與權勢的優勢，但漢人崔浩的身影並非消失，此點常被忽略。在世祖監國的短暫期間，崔浩隨從太宗甚密且可能正論述、規畫著北魏之發展大政方針。¹¹¹ 對比於前述勳貴大臣的輔政結構，此時崔浩也因太宗之信任而推動著國家政策方向。可見，《魏書》頗多記載雖簡略，仍可對比而勾勒出史實。這樣的政局現象所透露者，當時政情的穩定恐怕難以樂觀期待，彼此間應是處於衝突的

¹⁰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 27，〈穆崇傳附〉，頁 664：「（穆觀）襲（父穆）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還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穆）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

¹⁰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113，〈官氏志〉，頁 3014。

¹⁰⁹ 劉潔即是後來太和時期列入勳臣八姓之劉氏，可見此時政治地位高者，亦列入東宮輔政群，只是未列名於輔弼大臣。

¹¹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 28，〈劉潔傳〉，頁 687。

¹¹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4-815：「（泰常七年十月，422）太宗……親南巡。拜（崔）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為謀主。及車駕之還（泰常八年五月，423）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懋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得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情勢。¹¹² 如此的態勢、壓力下，當太宗一過逝，鮮卑貴族群立即出手反擊便是可以預期的：「世祖即位（泰常八年十一月，423），左右忌（崔）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¹¹³ 顯然地，鮮卑貴族之傳統勢力依然穩立朝中，故世祖初年之三公大臣以「北平王長孫嵩為太尉，平陽王長孫翰（？-430）為司徒，宜城王奚斤為司空」。¹¹⁴ 對崔浩而言，從太宗到世祖的政權轉移過程中，是其政治上的挫敗，¹¹⁵待至神䴥四年崔浩始進入三公「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370-451）為司空」，¹¹⁶重回朝政大臣之列。

接著，嘗試對世祖立皇太子一事試作解釋。在延和元年正月立恭宗後詔曰：

自始光至今，九年之間，戎車十舉。羣帥文武，荷戈被甲，櫛風沐雨，蹈履鋒刃，與朕均勞。……加以時氣和洽，嘉瑞並降，遍於郡國，不可勝紀，……公卿因茲，稽諸天人之會，請建副貳。夫慶賞之行，所以褒崇勳舊，旌顯賢能，以永無疆之休，其王公將軍以下，普增爵秩，啟國承家，修廢官，舉儻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¹¹⁷

上述詔文要義頗多：對外征戰已有階段性成果，各地亦有嘉瑞降生，因此，公卿大臣請建立儲君。並且，除了褒崇對國家有功的勳舊以外，國家未來的走向將從對外征戰轉為對內的治理，需要「修廢官，舉儻逸，蠲除煩苛，更定科制，務從輕約，除故革新，以正一統」。整體來說，詔文顯示世祖對統治拓跋帝國展開大幅轉型與整合的企圖心。

¹¹² 本文研判，太宗南巡期間崔浩隨從是無誤的，而執掌勳貴大臣輔政大權之穆觀則是留守輔助監國之世祖，兩方各行己意而升高對立。

¹¹³ （北齊）魏收，《魏書》，卷35，〈崔浩傳〉，頁815。

¹¹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0。

¹¹⁵ 崔浩在太宗初即位（永興元年，409）時，出任博士祭酒（從五品上），賜爵武城子。此後屢受太宗信任而常得以參議軍國要事，甚至（泰常七年五月，422）成為世祖監國的輔政大臣之一。於理，崔浩除了（泰常三年，418）承襲父親的白馬公爵位以外，應該其職官應有所晉升，只是史籍並未記載。此由（泰常七年十月，422）隨太宗南巡時，拜相州刺史，加官左光祿大夫（從一品中）可以推知。再由他被排毀逼出後，至〈崔浩傳〉，頁815：「始光中（約425），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從一品下）」來看，應該當時被逼出時的官爵有所降低。

¹¹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9。

¹¹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80。

雖然世祖屬於雄主型君主，但仍需就政局來解讀這段詔文。顯然地，這個詔文主要訴求的對象是有功於國的功勳大臣，藉此慶賞來「褒崇勳舊」。同時間，公卿「請建副貳」一事，需加分說。前述「太子拓跋晃的出生與生母賀氏」一節，已可觀察到世祖對各方傳統勢力的防範，但是，也表現出此時長子繼承制的複雜性與充滿變動性。因此，此時公卿大臣主動「請建副貳」之舉，恰是印證了如此的政治局勢。或可說皇太子之確立，大臣們仍延續著傳統部落大人之參與權。

然而，上述詔文揭示的另一重點是國家政策方針的調整，簡言之可說從武到文，即從對外征戰轉為對內治理。對拓跋政權而言，國政重心從軍事征戰漸轉為行政治理，實為國政走向之大轉型。這樣的發展軌跡在前一年徵士詔文（神䴥四年）中已經明確出現：

「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為，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儒乂，……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¹¹⁸

世祖此一徵士詔文揭示的政策方向更明確，「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而且，此一新政策方向主要就是徵用漢族士人以實踐「太平之化」。如此廣徵進用漢族士人菁英，在政治仕途上應會產生競爭，但對於鮮卑貴族的政治利益是否產生不利或是衝突，本文以為尚待驗證研究。¹¹⁹ 但是，對拓跋政權原有胡族優勢的組織結構來說，勢必引起胡族群體的危機感。而且，此一詔文之出現，綜合推論所謂「訪諸有司」，應是出自司徒崔浩之建議。¹²⁰ 因此綜論之，立恭宗與邁向新政方向同時並行，崔浩已經參與新政方向的事務。

¹¹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9。

¹¹⁹ 何德章推論新的政策和法令在各個方面「都損害了舊的特權階層即鮮卑貴族勳臣的利益」。何德章，〈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重慶：武漢大學歷史系，2000），頁51。

¹²⁰ 隨著北魏統治領域的擴展與統一以及外患威脅的降低，勢必借用漢人之才來治理漢人世界，儘量吸收廣泛的漢人社會勢力，由此拉攏其認同北魏政權並以官爵羈縻之。待始光三年（426）崔浩重回政壇後，他主導征戰於赫連昌、蠕蠕與南征之事都順利成功，遂神䴥四年（431）九月世祖下詔徵才前升任為司徒，這是漢人在北魏拓跋政權所擔任最高的官職。崔浩因極有功勞於北魏政權，遂深受世祖的寵信任用。在這樣的政治關係下，世祖徵才詔令所謂的「訪諸有司」推薦各地冠冕州邦的賢雋，相信應該不是代北勳貴們的推薦，而是當時深受重用的崔浩所推薦。再就崔浩的政治理想而論，他「常自比張良」，「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企圖建構出國家社會的大政方針。陳寅恪解釋崔浩的政治企圖在施行其「高官博學二者合一之貴族政治」，「欲孝法司馬氏以圖儒家大族之興起」；見陳寅恪，〈崔浩與寇謙

由上討論可見，北魏政局雖仍以勳貴大臣為主，但崔浩重回朝政大臣之列後頗為積極活躍，除了受世祖任用外，職官也晉升至三公之司徒（一品中）。在皇太子的角色上，亦可觀察到崔浩與恭宗及鮮卑貴族穆壽（？-447）的密切關係：

（太延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¹²¹

上述太延五年之事，即是〈恭宗紀〉所載「詔恭宗監國」一事，¹²²一般將此年視為世祖時期太子監國制度的開始。當時恭宗十二歲，世祖舉兵大規模出征，考量到國家之安全與恭宗能力尚不足，故由胡族勳貴之首的穆壽輔佐「決留臺事」。前述東宮體制的一般幕僚人員雖有一定數量編制，但是，應無穆壽輔佐「決留臺事」的大權。且，前面曾觀察出一般幕僚人員中，並無傳統鮮卑貴族。但是，在此所見是鮮卑貴族執掌東宮「決留臺事」的大權，代表著鮮卑貴族之政治優勢仍舊存在，世祖仍須安排其極重要的政治位置以示尊崇。

穆壽輔恭宗決留臺事看似與崔浩無關，但有一場景極重要：

與駕征涼州，命（穆）壽輔恭宗，總錄要機，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世祖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世祖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恭宗避保南山。

之），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一）》（臺北：里仁書局，1981）中之《金明館叢稿初編》，頁136、140。若將崔浩的想法驗證於當時被中央直接點名而有報到的三十五個門第士族，幾乎每個家庭背景都是政治仕宦經歷豐富，個個都是家業、德行兼具的儒學士大夫，完全符合於崔浩政治理想的條件。而且，從北魏拓跋政權的立場而論。為了讓漢人願意參與北魏政府，必須在基本立場上釋放出能吸引漢人的政治氛圍。「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即是製造友善政治氣氛的口號，指出政府規劃未來的文治政治方向，希望能改變漢人對游牧軍事起家善戰政府的既定印象，藉此能吸引漢人才士自幽窮中拔起。北魏政府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和社會產生直接密切的互動、聯繫。所以，若是崔浩提出徵才的話，自是順勢而為。

¹²¹（北齊）魏收，《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89。

¹²²（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附恭宗紀〉，頁108。

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世祖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123

對照上述引文，世祖交付穆壽「輔恭宗，總錄要機，內外聽焉」，符合於上述「輔皇太子決留臺事」。於理，世祖是信任穆壽才交付監國之要政。但是，卻特別「別御靜室」密談，且故意在崔浩、李順（？-442）兩漢人面前，幾乎是恐嚇的口吻下令威逼穆壽，這是令人懷疑的地方。

事實上，世祖交付穆壽的「決留臺事」主要是防範北方的蠕蠕。自世祖即位以來，幾乎每年皆與北方蠕蠕互有攻防戰事，身為朝政大臣的穆壽理應知悉此一基本邊防戰情。所以，當世祖率大軍出征，「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必來犯塞」，且「涼州路遠」必有無法救濟的基本情勢，應是穆壽很容易預判了解的狀況。可是，世祖卻特別還以警告口吻威嚇之。且，過去穆壽之表現是頗為世祖欣賞的傑出大臣而非無能之輩。¹²⁴ 加上世祖為防備蠕蠕尚佈署「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所以，應該不至於「侵及善無，京師大駭」。穆壽卻又慌亂不已而「不知所為」，這樣的結果與表現實在很難不令人起疑。因此，本文綜合推論起來，世祖威嚇穆壽場景的出現，蓋是世祖對於穆壽之「決留臺事」已存有不放心與擔憂，甚至可能懷疑其別有意圖。因此，後來穆「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是完全不符合其經驗能力的，難以令人信服。當時緊急狀態下，幸皇太后竇氏（378-440）鎮定的指揮才度過這次危機。¹²⁵

對於此次軍事危機的形成，本文以為恐因內部勢力的角逐、衝突而有以致之。當世祖準備征討河西王沮渠牧犍時，先詢問於崔浩且世祖認同其出兵征討之議。¹²⁶

¹²³ （北齊）魏收，《魏書》，卷 27，〈穆崇傳附〉，頁 665。

¹²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 27，〈穆崇傳附〉，頁 665：「（穆壽）少以父任選侍東宮。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世祖愛重之，擢為下大夫。數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從一品中），領南部尚書（二品中），進爵宜都王（太延元年五月，435），加征東大將軍（一品下）。」

¹²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 13，〈皇后列傳·太武惠太后竇氏傳〉，頁 326：「世祖感其（保母竇氏）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425），尊為保太后，後（432）尊為皇太后，……（439）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故此軍事危機發生時，應稱竇氏為皇太后，較符合史實。但在卷 27，〈穆崇傳附〉，頁 665 記載此事則稱其死後（440）諡號「惠太后」，會造成混淆史實順序的困擾。故，本文在此依據史實稱為皇太后。田餘慶對北魏皇太后已有討論，〈關於子貴母死制度研究的構思問題〉，收入田餘慶著，《拓跋史探》，頁 105。有載北魏有三種皇太后，竇氏此種「在子貴母死制度下，新君幼稚無母，往往由保母乳養撫育，保母有劬勞保護之恩，與新帝有特殊感情，因而新帝立後被尊為保太后，以後又徑尊為皇太后。」

¹²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22：「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

後來，「世祖大集群臣於西堂，議伐涼州」。¹²⁷ 這場公卿大議，鮮卑貴族領袖長孫嵩已死故由奚斤帶領三十餘人發言，他們的意見是反對出兵征討且堅持「彼無水草」，與世祖、崔浩針鋒相對僵持不下，然後，「世祖乃命（崔）浩以其前言與（奚）斤共相難抑」。最後這場大議仍是崔浩佔上風，但崔浩一人與奚斤等鮮卑貴族的公開衝突，也升高世祖與鮮卑貴族群的對立，種下朝政極不穩定的因子。¹²⁸ 這場大議恭宗亦有參加，起先他的態度較傾向奚斤而不支持崔浩，直到事後世祖才特下詔釋其疑。¹²⁹ 當時，穆壽是鮮卑勳貴中頗具權勢者，在這場大議的相關記載雖不見其相關記錄，但基於群體的共同利益，即使當時他未明確表態，但蓋可推知他必是立於奚斤等人的立場。

當世祖所領大軍在八月丙申（四日）至姑臧，¹³⁰ 應該是隨即以快驛將世祖釋疑的詔文送給平城留守的恭宗，告知「澤草茂盛」。當時，「輔皇太子決留臺事」的穆壽必知此事。如此，奚斤所領的鮮卑貴族群在這場政爭中是失敗的，是不得世祖信任的。所以，事後奚斤被技巧性地尊崇但卻下放為「諮訪朝政」的幕僚而已。¹³¹

在這場政治鬥爭過程中，世祖所領大軍至姑臧攤牌後，鮮卑貴族留守輔助監國的穆壽所能對抗崔浩者，蓋只有製造更多軍事困難與危機，才能使代人傳統之軍事專才得以在拓跋帝國佔有重要地位。故，穆壽的「不知所為」遂意外而不符合經驗地在九月戊子（二十七日）發生「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師大駭」的危機。¹³²

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

¹²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 29，〈奚斤傳〉，頁 700。

¹²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23：「（崔）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奚）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¹²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附恭宗紀〉，頁 108：「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恭宗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恭宗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敕，以釋汝疑。』恭宗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見帝也。』」

¹³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 4 上，〈世祖紀上〉，頁 89。

¹³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29，〈奚斤傳〉，頁 700：「涼州平，以戰功賜僉隸七十戶。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刑獄，諮訪朝政。」

¹³² （北齊）魏收，《魏書》，卷 4 上，〈世祖紀上〉，頁 90。

這場蠕蠕「侵及善無」的危機，在事後世祖「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穆壽，又是頗有可疑者。先前，世祖以威嚇口吻告誡穆壽：「卿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事實上，雖然沒有造成明顯「損傷」或「侵害」，但穆壽確實是有違世祖「指授」。本文以為奚斤被技巧性地尊崇下放後，為避免鮮卑貴族群反彈，故對當時第二順位的領袖穆壽輕輕放過。而且，穆壽父親穆觀於世祖朝的功勳無人能及。¹³³ 總之，世祖考量政局的穩定而做此有違前詔的決策。

討論至此，尚有一事可再討論崔浩與穆壽：「恭宗始總百揆（太平真君五年，444），（崔）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¹³⁴ 此事在《北史》記載亦有「復」字，¹³⁵意謂崔浩此次是第二度與穆壽共同輔恭宗政事。因此，若說太平真君五年是崔浩與穆壽二度輔恭宗政事，那往前推論便只有太延五年世祖西征威令「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這次了。所以，當太延五年西征之時，崔浩同是與穆壽一樣「輔（恭宗）政事」，只是，當時崔浩並無如穆壽一樣「輔皇太子決留臺事」鎮守京師，他是隨行世祖西征。若此的話，便可以理解何以當世祖威令穆壽鎮守京師之時，令崔浩在旁做證了。因為，兩人當時都是世祖命令輔恭宗的大臣，只是一人留守一人隨從出征。

所以，太延五年世祖西征而恭宗首次監國時，並非只有穆壽一人名列輔佐大臣而已，還有崔浩。而且，再細加檢視：「恭宗監國，（穆）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¹³⁶ 此一「等」字，《北史》記載亦有「等」字，¹³⁷意謂輔政大臣不僅穆壽與崔浩二人而已，尚有其他入，故言「人皆敬浩，壽獨凌之」。所以，自太延五年恭宗監國開始，世祖安排恭宗輔政大臣並非獨厚穆壽一人，而是採群體制。¹³⁸ 這樣的措施顯然是不欲獨尊鮮卑貴族，尤其是世祖長期的信任大臣崔浩亦列名其中，頗有平衡的用意。

¹³³ （北齊）魏收，《魏書》，卷 27，〈穆崇傳附〉，頁 664：「世祖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惜殷勤，以為自泰常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見稱如此。」

¹³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24。

¹³⁵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79），卷 21，〈崔宏傳附〉，頁 787：「及景穆始總百揆，（崔）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

¹³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 27，〈穆崇傳附〉，頁 665。

¹³⁷ （唐）李延壽，《北史》，卷 20，〈穆崇傳附〉，頁 740-741：「景穆監國，（穆）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

¹³⁸ 恭宗輔政大臣可能還有張黎，《魏書》，卷 28，〈張黎傳〉，頁 693：「世祖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車駕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之。」

雖然是採取東宮群體輔政制，但無可否認鮮卑勳貴穆壽仍具有優越的地位，這種現象源自於前已述及之拓跋政權組成的基本結構。故，穆壽敢於「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己及」，甚至自信的說「但令吾兒及（繼承）我，亦足勝人」。後來，的確如穆壽之自信預言。¹³⁹ 穆壽早自太延五年即擔任恭宗輔政大臣決留臺事，子穆平國又為恭宗之輔政大臣，可見在既有政治結構下其家族確享有特權地位。因此，穆平國所任「太子四輔」與其他官爵應是接續父親穆壽之職：

（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壬寅（六日），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¹⁴⁰

恭宗從太延五年開始監國以來已有六年，至此又更進一步「始總百揆」，如同是準皇帝一樣。穆壽又列名輔政大臣首位，持續保有鮮卑貴族的政治優勢，並傳承於子穆平國。

這次除了輔政大臣以外，另選有「諸曹良吏，給事東宮」，¹⁴¹即可能本文先前曾討論的東宮一般幕僚。然而，太平真君五年這次恭宗「總百揆」與輔政大臣之出現，可再加以說明。在前一年太平真君四年（443）九月世祖北伐蠕蠕，十一月回程至朔方時下詔：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亂，掃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圖長久，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朕心。¹⁴²

若此，張黎是留守的輔政大臣。關於此點，渚添慶文也曾推論「代理監國職權……分散在數人手中」。詳見渚添慶文，〈關於北魏的太子監國〉，頁89。

¹³⁹（北齊）魏收，《魏書》，卷27，〈穆崇傳附〉，頁666：「（穆壽）子平國，襲爵（真君八年，447）。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恭宗）四輔。正平元年（451）卒。」

¹⁴⁰（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96-97。

¹⁴¹（北齊）魏收，《魏書》，卷113，〈官氏志〉，頁2975：「真君五年正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輔政，置通事四人。又選諸曹良吏，給事東宮。」

¹⁴²（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96。

這個詔令的用意，是世祖宣示即將由恭宗「副理萬機，總統百揆」。然而，試比較於世祖出任太子監國時期的狀態，當時已經「臨朝聽政」、「攝政」，且太宗因有疾而積極安排世祖親臨一線親領政軍大臣以建立其領導地位。然而，檢視恭宗後來的行事歷程，世祖並沒有安排恭宗具體的領導活動。唯可印證的活動，是太平真君六至七年（445-446）展開的滅佛事件。¹⁴³ 雖然，這次事件是特殊狀態而非常態，但是，由此亦可看出世祖可能隨時介入、掌控國政大權。因此，恭宗「副理萬機，總統百揆」雖有排定穆壽等四位輔政大臣以及「選諸曹良吏，給事東宮」，但恭宗的角色似乎關鍵仍在世祖的意志。理解至此，蓋可確定詔令所說「以決庶政」應是如實的反應，重要的國政要務仍須視世祖的決定，並非凡事皆恭宗可及。¹⁴⁴

討論至此，猶記得本文開頭便討論恭宗之出生與立為皇太子，頗有不同於慣例的情形，目的在於防堵后家勢力及傳統部落勢力以使政權穩定與傳承。如今（444），距離恭宗立為皇太子（432）已經十三年，距離開始監國（439）已經六年，此時恭宗已經十七歲。相較於世祖短時間的監國，遂有研究便認為恭宗監國過久，導致其勢力與世祖勢力勢必引發衝突。¹⁴⁵ 對此問題，本文盡量以還原當時的背景來討論。

前述太平真君四年九月世祖回程至朔方下詔令前這段時間，正進行大議征討蠕蠕及後來的出征行動：

時議伐蠕蠕，（劉）潔意不欲，言於世祖曰：「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世祖決行，乃問於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從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故諸將不至。時虜眾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語在〈帝紀〉。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進（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

¹⁴³ （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3-3035：「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

¹⁴⁴ 雖論述方式不同，但本文的理解與湟添慶文的觀點類似。湟添慶文，〈關於北魏的太子監國〉，頁92-94。

¹⁴⁵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76。

罪在諸將，豈在於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發。與駕至五原，收潔幽之。¹⁴⁶

大議，是拓跋政權決策政軍大事的機制。¹⁴⁷ 這場大議結果，羣臣一面倒支持劉潔（?-443）「皆從其議」，決定不出征。然而，世祖採納崔浩一人之議毅然決定出征，推翻先前群臣的共識。過去的政軍大議，亦曾以崔浩一人之議而壓過眾多代北胡族大將之群議，¹⁴⁸尤其是神䴥二年（429）北伐蠕蠕之大議，¹⁴⁹胡族將領劉潔與安原（?-435）倡議反對以及保太后（432 年尊為皇太后）亦是反對，最終世祖仍是採納崔浩一人之議而出征。結果亦如崔浩所預料，¹⁵⁰因此，益加信任崔浩之所議而下令「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¹⁵¹

過去大議的經驗來看，可見胡族將領劉潔等與崔浩是針鋒相對而時有衝突。如今這場大議再度重挫劉潔，劉潔「恨其計不用」逼使其策畫一場陰謀政變。劉潔有足夠實力指揮這場政變，可見其在軍隊中有著崇高地位。當時，這種情勢恐是世祖不知情也無法掌控的。所以，如其所設計諸將不至而「軍出無功」且損軍實，又設計「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企圖使「車駕不返」而另立樂平王。¹⁵² 結果政變未成，崔浩舉發劉潔矯詔，大軍返回至河套五原時，世祖「收潔幽之」。

可想而知，這場北征蠕蠕必使世祖感懷不已。獨採崔浩一人之議出征，卻造成眾將領串聯皇室諸弟企圖政變取代自己，自己的皇位成為被覬覦的目標。他們之所

¹⁴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 28，〈劉潔傳〉，頁 688-689。

¹⁴⁷ 湮添慶文，〈北魏の議〉，《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頁 408-436。

¹⁴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5：「時（始光三年，426）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

¹⁴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5-817：「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讚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又群臣云）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慚報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

¹⁵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8：「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

¹⁵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19。

¹⁵² （北齊）魏收，《魏書》，卷 28，〈劉潔傳〉，頁 689：「世祖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

以串聯，憑藉的應是傳統部落推舉制與兄終弟及制精神的勾結，無視於依長子繼承制而準備繼承的皇太子。¹⁵³ 如此的狀況，又凸顯了傳統各勢力對繼承體制的挑戰與威脅。事實上，世祖所面對的依舊是來自於政權結構自身的限制與依舊尚未轉型的政治理念。

如今，集體的政變過後，必須盡快穩定政局與明確皇位的傳承，幸先前恭宗在戰場上的表現令世祖滿意，所以，衡量全體情況後，大軍返至朔方未至京城時，便先宣布恭宗「副理萬機，總統百揆」的詔令。¹⁵⁴ 向公卿大臣宣告已準備好皇位的傳承，繼承體制明確，以防再有覬覦篡奪者。

除了使恭宗「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以外，這次政治危機的處裡尚未結束，詔文中尚提及世祖朝功臣「皆當以爵歸第」，而東宮「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事後中央與東宮人事的更替已難確知，尤其世祖朝舊臣是否退隱。唯獨在隔年二月處死中山王辰等八將，所以，這次人事的更替情形是否大幅更替，頗令人起疑。¹⁵⁵ 同時間可以確定的人事案就是新任「太子四輔」，宜都王穆壽、司徒崔浩、廣平公張黎（？-452）與建興公古弼（？-452），輔太子以決庶政。然而，事實上他們依舊是世祖朝的舊臣，並非更舉的賢俊。

接著，再觀察新任輔政大臣「太子四輔」。排名首位的穆壽，史籍上除了前述在太延五年恭宗首次監國後，「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己及」的記載以外，再從太平真君五年恭宗「總百揆」以後至太平真君八年（447）死，則毫無穆壽的相關記載。位居「太子四輔」之首，理應是主要的記錄對象，卻僅知穆

¹⁵³ 何德章，〈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題〉，頁 47 亦以為「兄弟相傳及諸部擁戴的傳統還在起作用」。

¹⁵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附恭宗紀〉，頁 108：「真君四年，恭宗從世祖討蠕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虜惶怖，部落擾亂。恭宗言於世祖曰：『今大軍卒至，宜速進擊，奄其不備，破之必矣。』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為塵盛賊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須軍大集，然後擊之可也。恭宗謂潔曰：『此塵之盛，由賊恆擾，軍人亂故，何有營上而有此塵？』世祖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世祖問之，對曰：『蠕蠕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自是恭宗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

¹⁵⁵ 處死之人應該是參與政變者，除了中山王辰以外，當有劉潔與狄隣，《魏書》，卷 28，〈劉潔傳〉，頁 689：「潔與南康公狄隣及（右丞張）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還有樂平王丕，《魏書》，卷 17，〈明元六王列傳·樂平王傳〉，頁 414：「後坐劉潔事，以憂薨。」樂安王範，《魏書》，卷 17，〈明元六王列傳·樂安王傳〉，頁 415：「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但是，《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頁 102：「（太平真君八年 447 年）八月，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薨。」故暫難以判定何者為是。此外，以及南陽公奚眷，《魏書》，卷 30，〈奚眷傳〉，頁 722-723：「世祖征蠕蠕，以眷為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壽子穆平國（？-451）接任父職為太子四輔，也無相關輔政記載，僅知後來於正平元年（451）卒。因此，本文推斷自太平真君五年恭宗「總百揆」以後，至正平元年恭宗卒這段時間，東宮必有頗大的變動，且與穆氏家族密切相關，魏收刻意隱瞞之。

相對於穆氏父子空白的輔政紀錄，其他三位的輔政紀錄就清楚明確：

及恭宗始總百揆，（崔）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¹⁵⁶

恭宗初總百揆，（張）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勳。」¹⁵⁷

恭宗總攝萬幾，徵（古弼）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¹⁵⁸

從輔政大臣的相關紀錄來看，崔浩持續受到世祖重用，往往隨軍出征擔任幕僚而「議軍事」，但也需任職東宮而兩邊忙碌，故稱「輔東宮之勤」。張黎與古弼都是世祖的忠臣而被任以輔東宮，兩人的紀錄裡都提及「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顯然這即是世祖規劃忠臣輔東宮的用意。所以，雖然穆氏父子的輔政紀錄空白，但仍可看到恭宗雖已「總百揆」而世祖依然處心經營東宮。

¹⁵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35，〈崔浩傳〉，頁824-825。

¹⁵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28，〈張黎傳〉，頁693。

¹⁵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28，〈古弼傳〉，頁691。

陸、東宮勢力之擴張

一般討論世祖與恭宗關係者，多聚焦於東宮勢力之膨脹以致最後東西宮產生衝突。¹⁵⁹ 可是，未有進一步討論東宮勢力究竟達到什麼程度者，本文嘗試就有限的資料討論東宮勢力較具體的情形。

恭宗是在傳統力量充斥的複雜環境出生，世祖破除「不崇儲貳」的慣例而尊崇地立其為皇太子，但意義主要在向公卿大臣宣示繼承體制的確定，以防覬覦的勢力。後來，世祖對東宮幕僚人員的布局顯有謹慎掌控。即使世祖處心經營或說掌控東宮的情勢，仍可觀察到恭宗的擴張動向。在于洛拔（415-458）之例可見：

（于洛拔）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車駕征討，恒在侍衛，擢領監御曹事。……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恒畏避屏退，左轉領侯宮曹事。¹⁶⁰

代人勳貴于洛拔是北魏軍功大臣于栗磾子，于栗磾（生卒年不詳）從太祖、太宗至世祖朝由子爵晉升至公爵。¹⁶¹ 如此的家庭背景，使于洛拔在世祖初期得以「功臣子」身分進入仕途。

「功臣子」不僅是對軍功大臣家庭特權之保障延續，也是維繫臣僚忠誠君主的機制，更是保持穩固基礎勢力的重要方法。功臣子于洛拔是世祖忠誠受寵的僚屬，並非恭宗的東宮幕僚。可是，恭宗卻是「厚加禮遇」，頗有吸納成為部屬的用意。恭宗如此召聚幕僚的動作，亦可見於王叡（天安初年卒）之例。¹⁶²

¹⁵⁹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 137：「東宮集團的勢力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如今已難確知，但是，從太武帝處理東宮集團時煞費心機來看，從正平事變的風雲息歇後竟是太子拓跋晃之子當了皇帝來看，這應該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川本芳昭以為世祖恭宗產生對立相剋，是由宗教信仰及方針理念等之相違，遂產生權勢的衝突。參見川本芳昭，〈景穆太子と崔浩〉，頁 103-116。

¹⁶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 31，〈于栗磾傳〉，頁 737。

¹⁶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31，〈于栗磾傳〉，頁 736：「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

¹⁶² （北齊）魏收，《魏書》，卷 93，〈恩倖列傳·王叡傳〉，頁 1988：「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

於理，恭宗是儲君也是準帝位繼承人，是未來掌最大權位者，臣僚若是積極結納自可謀求未來的官爵權位。因此，從于洛拔的事例推論之，當時應該不少東宮官署以外的官僚「逆自結納」於恭宗。這些東宮官署以外的官僚，實即是皇帝所統屬之臣僚。若是「逆自結納」於恭宗，便有對世祖忠誠方面的問題，于洛拔便是選擇忠誠於原職。但是，當東宮積極吸納僚屬時，自然可能產生往東宮靠攏的趨勢。

上述于洛拔之例，可由側面推敲出恭宗發展勢力的趨勢。另在屈垣的事例中亦可觀察到世祖恭宗父子關係不穩定的一面：

（屈）垣在（東）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真君四年（443），墜馬卒，時年五十五。時（四月）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¹⁶³

前面推斷延和元年屈垣領太子少傅，即剛立皇太子成立東宮體制時，他是深受世祖信任的東宮輔臣，故「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墜馬事發之時，恭宗立即遣東宮人員快馬向世祖稟報，可見他知道世祖任命屈垣在東宮的重要角色。世祖當下的反應透露出重要訊息，他並不相信屈垣是墜馬卒，而是直陳「汝等殺朕良臣」。這個「汝等」是恭宗派往稟報的東宮人員，世祖視為同夥的加害者，而恭宗又是「汝等」的主人。因此，可見世祖所想是恭宗與其東宮幕僚陷害其派任的良臣。若關注此細微處，雖無從得知具體情況，但可窺見世祖與恭宗間關係不穩定的一面。

另在李孝伯（？-459）之例中，亦可觀察到恭宗在後期之意向：

（李）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¹⁶⁴

因為「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¹⁶⁵所以，恭宗此建議極可能是崔浩被誅（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以後所提出。在此，雖人事任用仍需得世祖同意但恭宗主

¹⁶³ （北齊）魏收，《魏書》，卷 33，〈屈遵傳〉，頁 777-778。

¹⁶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 53，〈李孝伯傳〉，頁 1172。

¹⁶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 53，〈李孝伯傳〉，頁 1172。

動提出「廣徵俊秀」，便顯得恭宗可能有所召聚人士的企圖。或許，由此反映出恭宗不喜於世祖用人之模式與種類，而欲另謀他士。但，由此亦可見及世祖對恭宗企圖「廣徵俊秀」之抑制。

又先前與崔浩衝突的過程中，可見及恭宗所屬的勢力：

初，李靈為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崔）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彥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為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¹⁶⁶

李靈（約 390-452）「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而為「高宗博士」，¹⁶⁷自是世祖所任命。¹⁶⁸ 世祖不僅先前積極為恭宗安排頗多，連下一任繼承人皇孫高宗尚未立為皇太子便已仿行恭宗初立為太子時的措施，這些雖只是教授的工作但卻是重要的職位。在這件事中可見，世祖是交付崔浩徵選高宗的教授幕僚，以崔浩的學識能力及當時他的地位實屬合理。但是，崔浩意圖透過親戚網絡以擴張政治勢力，為未來的資源權位而佈局。¹⁶⁹ 此舉使高宗父親恭宗不僅是感到「不平」，恐更有權勢上對其產生威脅與不安。高祐（？-499）及段霸（生卒年不詳）兒姪等人主動將此事「言於恭宗」，實應他們是屬於恭宗之陣營者：

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段）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為庶人。¹⁷⁰

¹⁶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 46，〈李訢傳〉，頁 1039。

¹⁶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 49，〈李靈傳〉，頁 1097。

¹⁶⁸ 時間推算起來，高宗出生於太平真君元年（440），當初恭宗在五歲（延和元年，432）立為皇太子以後開始有輔佐教授人員的出現，所以，為高宗安排教授人員應該也是高宗五歲時，此時即真君五年（444）恭宗「始總百揆」的時間。

¹⁶⁹ 崔浩弟之子崔箱子無須多論，關係自是親近。盧度世除了崔浩是父親盧玄的外兄以外，在崔浩事件中更可見與崔浩之緊密關係，《魏書》，卷 47，〈盧玄傳〉，頁 1046：「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敕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李敷與崔浩之關係，亦是跨越兩代從父親李順便與崔家有姻親關係，《魏書》，卷 36，〈李順傳〉，頁 829：載兩家有二門婚媾，「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又，至第二代李敷仍與崔氏聯姻，《魏書》，卷 55，〈劉芳傳〉，頁 1219：「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

¹⁷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 94，〈閭官列傳·段霸傳〉，頁 2015。

由此可見，恭宗除了先前世祖為其安排之輔佐幕僚以外，他自己亦有所屬的親近僚屬，高祐、段霸及其兒姪便是如此的角色。所以，在與崔浩陣營之對抗過程中，已可看到恭宗確有發展出自己陣營的勢力。諸如此種在文獻上較不明顯的東宮勢力，還有「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¹⁷¹。

東宮勢力與崔浩勢力之衝突，除此以外，尚有地方首長的任命案：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¹⁷²

此事更是與恭宗之間直接產生嚴重的權力衝突。於理，恭宗所持以前召而有經驗者出任較為合理，但崔浩強勢以其新推薦之人出任，實有建立個人人際關係網絡的重大嫌疑。而且，此時正是恭宗擴張勢力的時機，崔浩強勢所排除者，極可能便是恭宗陣營者。高允已經侍講恭宗甚久，深知此事性質與底線者。雖然崔浩受世祖信任重用，但此舉等於挑戰、逾越了恭宗的政治威權與勢力，故高允直指此事之關鍵在「逞其非，而校勝於上」。

崔浩與恭宗之關係尚需上溯至太平真君六至七年(445-446)隨西征盧水胡蓋吳而展開的滅佛行動。這場行動崔浩著力頗深，崔浩「進其說(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影響頗大，故世祖下詔誅沙門。¹⁷³ 恭宗是「素敬佛道」的信仰者，故世祖下詔後極盡的搶救。滅佛一事使崔浩與恭宗之衝突關係必是升高，加上上述高宗教育幕僚的任命與地方郡守的任命兩事上，崔浩與恭宗接連產生權勢的衝突。

崔浩可謂是世祖朝最受信任重用的大臣，前已論及世祖不採胡族勳貴與胡人功

¹⁷¹ (北齊)魏收，《魏書》，卷94，〈閣官列傳·宗愛傳〉，頁2012。

¹⁷² (北齊)魏收，《魏書》，卷48，〈高允傳〉，頁1069。

¹⁷³ (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3-3034：「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寇)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為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驕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將之大議的具體事蹟，且此時崔浩擔任恭宗之輔政大臣。如此的情勢下兩方產生衝突，可從雙方各自的立場來觀察。一就恭宗敢與崔浩抗衡權勢，正顯現恭宗在「副理萬機，總統百揆」後，已經在這些動作上試圖擴張其權勢。二就崔浩的立場來看，在恭宗與高宗的幕僚任命上，都可以看到崔浩試圖布局親友盧度世等進入，也是顯現其權勢之延伸擴張。¹⁷⁴ 因此權勢脈絡的發展來觀察，恭宗與崔浩之衝突遂與日俱增，終至崔浩事件過程中可見及恭宗角色之重要。¹⁷⁵ 因此，就北魏世祖末期的政情來看，實有著頗為複雜的一面。

再者，如果從正平事變後最終由恭宗之子高宗當上皇帝的角度觀察，亦可見及恭宗之勢力。在代人勳貴陸氏的記載中可見：

（陸）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僚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係，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矣。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¹⁷⁶

由此角度來推論，可見陸麗「首建大義」擁立恭宗子高宗至為關鍵，亦可印證於〈劉尼傳〉。¹⁷⁷ 而陸麗（？-465）之所以「首建大義」，線索可由恭宗曾賜妻於陸麗看起：「（陸麗子）叡，字思弼。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叡。」¹⁷⁸ 一般而言，僅有皇帝才有賜妻之舉，恭宗卻將宮人賜給胡族勳貴，顯見其與陸氏間必有相當聯絡與熟識。比較先前之一般幕僚人員與輔政大臣，並無出現胡族勳貴陸氏，僅有穆氏之穆壽與穆平國父子相繼出任輔政大臣。然而，穆平國在正平事件中應是

¹⁷⁴ 如恭宗幕僚盧玄子盧度世，崔浩本是盧玄外兄。盧度世從兄盧遐亦可能是恭宗幕僚，而盧遐妻正是崔浩女，見於《魏書》，卷38，〈王慧龍傳〉，頁877。又如高宗幕僚，崔浩欲推薦兄子崔箱子與姻親盧度世、李敷等，彰顯其為未來的資源權位而佈局。從此權勢擴張的觀點來看，便可以理解崔浩事發盧度世棄官逃命時，世祖為何要下令於恭宗，《魏書》，卷47，〈盧玄傳附〉，頁1046：「詔東宮敕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

¹⁷⁵ 牟潤孫，〈崔浩及其政敵〉，收入牟潤孫著，《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80-93。其文以佛道之爭來論述崔浩事件，本文在此則觀察恭宗與崔浩的權勢脈絡，可互相參照。

¹⁷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40，〈陸侯傳附〉，頁907。

¹⁷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30，〈劉尼傳〉，頁721：「（劉）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

¹⁷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40，〈陸侯傳附〉，頁911。

相當重要的人物，但紀錄僅見「為太子（恭宗）四輔。正平元年（451）卒」，相較於前所述其他輔政大臣（崔浩、張黎與古弼）的明確紀錄則顯有頗多隱晦。當穆氏遭整肅後，極可能取代其胡族勳貴領導地位者便是陸氏。又，之前與恭宗間頗有密切往還，故當陸麗「首建大義」擁立高宗時，足以號召各方力量支持，頗有傳統部落大人擁立的跡象。因此，在宗愛事件造成「百僚憂惶，莫知所立」的情況下，之所以最後由恭宗子高宗「當上皇帝」，實因恭宗與胡族勳貴間有著密切交往或彼此援結。如此互相援結的關係，甚至延續至高宗、顯祖時期。¹⁷⁹

上述簡略的討論可知，陸麗是援結於恭宗而成為東宮勢力最顯明的代表者。除此以外，曾為東宮官僚者因近屬之關係，亦很有可能是擁護東宮之勢力，這些人物有賈秀、¹⁸⁰薛提、¹⁸¹李敷、¹⁸²慕容白曜、¹⁸³韓茂父子等。¹⁸⁴

此外，再比對文獻中隱晦不明者，可能加入東宮勢力而與世祖產生衝突者還有高涼王那（？-451）與略陽王羯兒（？-451）：「（高涼王那）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¹⁸⁵、「（略陽王羯兒）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¹⁸⁶高涼王那與略陽王羯兒並非在「正平（年）初」賜死，而是在六月恭宗死前六日被賜死，¹⁸⁷蓋與胡族勳貴穆平國同時被賜死。高涼王那是平文皇帝直系子孫，略陽王羯兒本是太祖孫河南王曜之子，與世祖同輩份，世祖令其襲封河間王脩（？-416）之

¹⁷⁹（北齊）魏收，《魏書》，卷40，〈陸侯傳附〉，頁908：「（陸麗子）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歲，為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

¹⁸⁰（北齊）魏收，《魏書》，卷33，〈賈秀傳〉，頁792：「（賈）秀，歷……太子中庶子……恭宗崩，以爵還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

¹⁸¹（北齊）魏收，《魏書》，卷33，〈薛提傳〉，頁795：「薛提，太原人也。……（遷）太子太保……世祖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為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為侯。」

¹⁸²（北齊）魏收，《魏書》，卷36，〈李順傳附〉，頁833：「（李）敷，……以忠謹給侍東宮……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

¹⁸³（北齊）魏收，《魏書》，卷50，〈慕容白曜傳〉，頁1116-1117：「慕容白曜，……少為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

¹⁸⁴（北齊）魏收，《魏書》，卷51，〈韓茂傳〉，頁1128：「（韓茂長子備拜太子庶子）高宗踐阼，拜（韓茂）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

¹⁸⁵（北齊）魏收，《魏書》，卷14，〈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高涼王傳〉，頁350。

¹⁸⁶（北齊）魏收，《魏書》，卷16，〈道武七王列傳·河間王傳〉，頁399。

¹⁸⁷（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105-106：「（正平元年六月壬戌）略陽王羯兒，儀同三司、高涼王那有罪賜死。戊辰，皇太子薨。」

爵，兩者皆具有皇室的貴重身分。胡族勳貴穆氏與拓跋皇室成員，應該都是恭宗勢力群中的核心份子。

平心而論，皇太子年紀已長且具備能力，在東宮已久且是未來繼位的儲君，與皇室大臣及胡族勳貴等親從往來，應該是自然的發展，也是世祖所能理解與接受的情形。甚至，恭宗主動吸收、禮遇臣僚以培育未來執政之官員，應該也是在世祖可以理解與掌控的範圍，似不應該視之為勢力過度膨脹。而且，數次與崔浩衝突過程中，未見恭宗權勢之佔到優勢或勝利，所以，關於東宮之勢力很難說是過於膨脹。

此外，再根據高允在正平事件發生前，對恭宗提出之諫言來瞭解東宮權勢之發展趨向：

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高）允諫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¹⁸⁸

崔浩死後，若不論世祖的勢力，在政壇上幾無可以威脅恭宗的勢力。所以，依據太宗、世祖所規畫的長子繼承制，至此已實行幾近三十年，於理於制度上，恭宗安穩的等待便可順利繼承皇帝大位。況且，他已援結胡族勳貴之穆氏、陸氏等以及廣結各方幕僚，為總百揆以後真正的臨朝做準備。可是，此時世祖依舊忙碌於北巡及出征，完全沒有準備退位的跡象。雖然恭宗已總百揆，但世祖依舊主控朝政的局勢。因此，始終處於受控制的政局極可能使恭宗不耐於久候。畢竟，在恭宗以前從未有任皇太子監國如此長久的前例可循，且，恭宗已成長至二十三歲頗有能力的階段。因此政治格局限制下，恭宗產生的不耐與不願是可以理解的，遂轉而衍生出專務於牟利。

¹⁸⁸（北齊）魏收，《魏書》，卷48，〈高允傳〉，頁1071-1072。

就恭宗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高允的諫言，最關鍵者便是恭宗之用人，至於營利只是附屬衍生的問題而已。高允所強調者在於「斥出佞邪，親近忠良」，不該採用當時「侍御左右者」。從用人角度來看此事，也可推知恭宗當時確有任用臣僚的事情，只是任用是否得當。當時高允明確指出「天下者，殿下之天下」，「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語意完全視其為接任的君主。可是，即使高允所言只是尚未成真的事實宣示，但恭宗依舊「不納」，正代表著他不再等待這「尚未成真的事實宣示」。所以，簡要而言，即使從高允所見所論恭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之事來看，實談不上是過度擴張、膨脹勢力。

柒、 正平事變之發展

正平事變主角是世祖與恭宗，故兩人的關係變化便顯得重要，試從歷史發展脈絡來觀察。在太平真君九年（448）以後可見：「（太平真君九年十二月）皇太子朝于行宮（陰山），遂從北討，至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¹⁸⁹太平真君五年恭宗總百揆以後，世祖依然頻繁的出征，尤其常至陰山停留或北伐，充分展現其為善戰的君主。在太平真君九年以後首見「皇太子朝于行宮」並跟從北伐，表面上無法判定兩人關係之變化。但是，於理恭宗的角色是在世祖出征時應鎮守京城，然從此以後卻是看到世祖、恭宗同時出征。雖然之前在太平真君四年（443）恭宗曾與世祖同征蠕蠕，然文獻所見也僅此一次。相較於往例，太平真君九年以後兩人的同征行動以及戰略安排顯得異常，研判兩人之關係恐怕不穩定。令「皇太子朝于行宮」自是世祖的意志，可能他認為恭宗監國與否，並不影響其統治局勢。

太平真君九年北伐後蓋停留於漠南，待隔年正月再次北伐：

¹⁸⁹（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103。

（太平真君十年正月），帝在漠南，大饗百僚，班賜有差。甲戌，北伐。……（三月車駕還宮，五月行幸陰山）九月，閱武磧上，遂北伐。……（十月）皇太子及羣官奉迎於行宮。¹⁹⁰

事實上，太平真君十年正月的北伐恭宗仍是同征：「（太平真君）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¹⁹¹ 近一年之內，世祖兩度要皇太子隨從北討以及至行宮，似有掌控其行動的用意。而且，太平真君十年正月及九月兩度北伐以後，蠕蠕已經衰弱遠竄，¹⁹²但是，隔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世祖將戰場轉移至南方時，卻依然派恭宗北伐：「（九月）輿駕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吳王余留守京都。」¹⁹³ 於理蠕蠕已經衰弱遠竄，不需急於派皇太子北伐且屯于漠南，理應監國留守京城。而且，從前述討論東宮幕僚發現功勳將領豆代田原本從駕南討，突然轉為太子太保並出為統萬鎮大將。¹⁹⁴ 因此，恭宗之北伐應是世祖的安排，豆代田就是世祖派任的監督者。加上「吳王余留守京都」，遂令學者對恭宗此時身分角色的解讀有不同的觀點。¹⁹⁵

據上述的推論觀察可知，至正平元年（451）前世祖、恭宗父子關係確有可能不穩定。就正平事變的末段發展，李憑先生判斷恭宗是在正平元年二月車駕「次於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時被執，¹⁹⁶這判斷應是無誤的。然而，此時已是進入事件結果階段，所以為盡量了解事件發展的過程，應試圖回溯歷程才是重點所在。

正平事變重要基本史料出於〈宗愛傳〉：

宗愛，……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

¹⁹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103。

¹⁹¹ （北齊）魏收，《魏書》，卷103，〈蠕蠕傳〉，頁2294-2295。

¹⁹² （北齊）魏收，《魏書》，卷103，〈蠕蠕傳〉，頁2295：「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

¹⁹³ （北齊）魏收，《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104。

¹⁹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30，〈豆代田傳〉，頁727。

¹⁹⁵ 這樣的發展趨向，似在二月時已出現跡象，《魏書》，卷4下，〈世祖紀下〉，頁104：「（太平真君十一年二月，450）大治宮室，皇太子居于北宮。」此治理之宮室當是東宮，故恭宗必須轉居於北宮。但是，東宮於延和三年（434）始建成，僅歷經17年卻大治宮室，頗令人起疑。又，李憑也以為「從而取消了拓跋晃的監國之權」。本文根據前後發展的脈絡關係所得的理解如上，不過，張繼昊，〈從數件史事論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燾的君權〉，頁101，張繼昊則以為：「顯示拓跋晃與下一任『皇帝』的距離已愈益接近。」詳見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130。

¹⁹⁶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129。

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為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為也。¹⁹⁷

宗愛（？-452）是隨從於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的南征，也是正平元年正月班賞受爵者之一。¹⁹⁸ 如前所述，恭宗久在東宮監國之位且是未來帝位繼承人，也會自行吸收召納自己的幕僚藉以擴張勢力。世祖一向謹慎控管東宮，對於東宮臣僚舉動的情況，自然是「頗聞之」。在雙方權勢緊張關係中，中央朝廷與東宮臣僚間各藉「權勢」而「不睦」，自是可以想像會發生。

宗愛利用隨行南征期間，「構告」給事仇尼道盛（？-451）、侍郎任平城（生卒年不詳）等東宮幕僚之罪。若如上所述中央與東宮間難免有緊張關係或衝突，世祖自然是知悉，可是要構告成為「罪」，顯然事態必須嚴重於平時彼此的緊張關係甚多。這應是爆發為正平事變的關鍵。當然，世祖個人的統治風格確有曾被「構告」而殺戮的紀錄，如李順事件、¹⁹⁹崔浩事件等。²⁰⁰ 宗愛侍從於世祖，自是知悉世祖此一可產生「構告」效果的性格。此外，學者已論的宦官側近政治亦是事發的一重要因素。²⁰¹

除了個人性格與側近政治因素以外，本文以為必與當時環境情勢相配合才得以促成事變，以下試論之。因此事件而亡的相關重要死者，除了上述的仇尼道盛與任

¹⁹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 94，〈閹官列傳·宗愛傳〉，頁 2012。

¹⁹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頁 105：「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羣臣於江上，班賞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

¹⁹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 36，〈李順傳〉，頁 833：「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

²⁰⁰ （唐）李延壽，《北史》，卷 21，〈崔浩傳〉，頁 789：「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新校資治通鑑注》，卷 125，〈宋紀 7〉，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四月條，頁 3942：「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

²⁰¹ 鄭欽仁，〈北魏中常侍稿——兼論宗愛事件〉，收入氏著，《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篇》（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頁 169-189。

平城等以外，本文以為還包括穆平國、²⁰²高涼王那、²⁰³略陽王羯兒等。²⁰⁴《魏書》對三者與正平事變的關係記載皆極簡略，如「正平元年卒」、「正平初，坐事伏法」與「正平初，有罪賜死」而已，顯得刻意隱瞞此一重大事變的情節。穆平國是當時首屈一指的胡族勳貴，高涼王那與略陽王羯兒是皇室後裔，尤其高涼王那是世祖後期最具功勳的武將。若是宗愛構造其聯合謀反，則形成的勢力威脅必不小，確會令世祖憤而相信。這些被殺的相關臣僚，並無世祖所任命的任一東宮幕僚，本文判斷是恭宗私下所召聚之幕僚與交往的公卿大臣，故所謂「東宮官屬多坐死」應該是此義。²⁰⁵如此理解的話，則東宮勢力可能形成以恭宗為首的謀反群體。可想而知，地位崇高的穆平國、高涼王那與略陽王羯兒等都是頗具勢力的公卿大臣，更有召聚各方勢力的聲望。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激怒世祖認定其有「罪」。

自世祖監國以來，拓跋政權看似邁入長子繼承制，但本文逐一就史實討論所見，母后勢力、兄終弟及制勢力與功勳武將勢力等，都使長子繼承體制發展頗為曲折而不順利。世祖正是此一體制發展過程的經驗者，他也做了不少防範措施。所以，在世祖尚未有退位的情況而恭宗又長期等待下，宗愛之「構告」是結合此一傳統形勢的話，的確已危及世祖權位而容易成「罪」。

綜合上述各項之討論，宗愛之「構告」與事實間的距離，今天極盡研究之能事也難以判定。但可確定者，東宮情勢之發展應是難以得到世祖的信任，遂有事變之悲慘結果。事後，〈宗愛傳〉載「世祖追悼恭宗」，顯示了世祖的悔意，《通鑑》亦載「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²⁰⁶可見，世祖於事後才清楚恭宗並無被構告之「罪」。本文以為根據輔政局勢與東宮發展的脈絡理解正平事變，較符合前後的邏輯關係。若採用《宋書·索虜傳》與《南齊書·魏虜傳》的說法，²⁰⁷恭宗顯有謀反

²⁰²（北齊）魏收，《魏書》，卷 27，〈穆崇傳附〉，頁 666：「（穆壽）子平國，襲爵（真君八年，447）。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恭宗）四輔。正平元年（451）卒。」

²⁰³（北齊）魏收，《魏書》，卷 14，〈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高涼王傳〉，頁 350：「（高涼王那）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

²⁰⁴（北齊）魏收，《魏書》，卷 16，〈道武七王列傳·河間王傳〉，頁 399：「（略陽王羯兒）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²⁰⁵（宋）司馬光，（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87），卷 126，〈宋紀 8〉，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六月條，頁 3971。

²⁰⁶（宋）司馬光，（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卷 126，〈宋紀 8〉，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六月條，頁 3972。

²⁰⁷（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75），卷 95，〈索虜傳〉，頁 2353：「熹至汝南瓜步，晁私遣取諸營，鹵獲甚眾。熹歸聞知，大加搜檢。晁懼，謀殺熹，熹乃詐死，使其近

謀殺行動，世祖應不致會有悔意了。因此，事後高允與世祖之淚眼相見，充分表露出世祖的悔恨與痛苦，²⁰⁸以及宗愛才會「懼誅，遂謀逆」襲殺世祖。

正平事變之發生，應是源於東宮與中央臣僚權勢之鬥爭，加上恭宗召聚累積不少勢力，遂被利用而上升為天子與皇太子的衝突。此一事件頗為複雜已不易釐清，但確定此事件之影響，使得太宗、世祖長期規畫執行的長子繼承制遭遇挫敗。且，從本文所論邁向長子繼承制發展過程中，頻有不穩定因素與威脅勢力滋生，世祖個人的因素亦不可忽略。此時當恭宗死後，世祖之作為又是一例。正當恭宗死後面臨繼承人選的問題：「（十二月）車駕還宮。封皇孫濬為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封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²⁰⁹ 後人誤以為此舉可見「世祖立孫之意定矣」，²¹⁰其實，世祖未立即對高宗的角色予以確定。本文以為當時之困境在於皇太子已逝而未曾即位，對於世嫡皇孫在長子繼承制裡的定位不明，故曾經一度欲使高宗「在藩」而有另覓繼承人的想法，終致世祖並未斷然採取確立皇太子的措施。隨之所見，僅是立世祖諸子為王，企圖以藩屏王室。世祖個人對繼承體制的猶疑不定，在其被宗愛突然殺害後，在公卿大臣間亦是並無共識而不決，終又為宦官宗愛操控一時局勢。²¹¹

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78），卷 57，〈魏虜傳〉，頁 983-984：「宋元嘉中。偽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竝怒，手刀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頁 120-130，作者論證方式採用南朝的記錄，亦可參考之。

²⁰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 48，〈高允傳〉，頁 1072：「恭宗之崩也，（高）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昇階歎歎，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

²⁰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 4 下，〈世祖紀下〉，頁 106。

²¹⁰ （宋）司馬光，（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卷 126，〈宋紀 8〉，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十二月條，頁 3972。

²¹¹ （北齊）魏收，《魏書》，卷 94，〈閹官列傳·宗愛傳〉，頁 2012-2013：「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


因此，雖然世祖是北魏實行長子繼承制與太子監國制的當事人，他也企圖依循這兩項制度而行來穩定帝國之統治，可是，將正平事變前後過程置於北魏歷史脈絡觀之，依舊可見北魏繼承制度遭遇的侷限與危機。

捌、 結論

田餘慶先生〈北魏後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一文，所論子貴母死之制是與解散部落搭配而行，將拓跋政權政治社會體轉型過程中的癥結問題揭露出來。本文經過對太宗、世祖朝較微觀的研究，在君主繼承問題及其實踐情形中，依然可見拓跋政權之轉型持續進行調整中。就邁向專制君主帝國的長子繼承制角度來看，最大的阻力、威脅與不穩定因素，仍是來自於其政權自身與各種傳統勢力，彰顯出政治社會體轉型之不易。

觀察對恭宗的出生及生母賀氏的安排，可見世祖雖有意維護長子繼承制的發展，但對體制定位的不明確及不同於慣例的作為，使得恭宗所代表的繼承體制充滿變動性。繼承體制之所以形成複雜狀態，正是來自傳統各種勢力（部落大人推舉制、兄終弟及制與母后勢力等）的延伸影響所致，這種情形到世祖朝以前依然顯著。雖然，太宗、世祖採行了各種防範措施，但長子繼承制依然受到威脅。

東宮的建制也處於轉型階段，至世祖時東宮的規模始致完整。從東宮幕僚的任命可見世祖的謹慎經營，且，東宮幕僚亦是世祖所掌控的忠誠僚屬。傳統鮮卑貴族出任東宮的職務並非一般幕僚，而是位高的輔政大臣。因為拓跋政權組織結構的特質，他們在政權上形成優勢型態，也對繼承體制有著重要影響。崔浩與他們的競爭、鬥爭，從太宗朝廷續到世祖朝末期，尤其與皇太子的關係上充分反映出來。太延五年恭宗首次監國穆壽決留臺事，即是一具體事例。太平真君五年恭宗始總百揆，背後更是崔浩與勳貴劉潔及皇室大臣之衝突結果，《魏書》簡略的記載反而更凸顯東宮輔政大臣之動盪。

東宮的情勢一向在世祖的掌控中，恭宗的勢力雖有擴張成長，但應不致於過度膨脹。但，爆發正平事變的關鍵因素，除了世祖個人風格與世祖恭宗父子關係不穩定外，尤在於宦官宗愛利用傳統勢力威脅繼承體制的形勢而得以構告成罪，使得繼承體制再度遭遇挫敗與危機。因此，太宗、世祖朝規畫實施的長子繼承制，始終未形成明確的定位與基礎，未與原有政治社會體融合銜接，可謂拓跋政權轉型中尚未完成的一大課題。

附表：北魏前期君主諡號姓名對照表

君主姓名	君主諡號	君主廟號	備註
拓跋珪	宣武皇帝→道武皇帝	烈祖→太祖	太宗泰常五年 (420) 改諡號； 高祖太和十五年 (491) 改廟號
拓跋嗣	明元皇帝	太宗	
拓跋燾	太武皇帝	世祖	
拓跋晃	景穆太子→景穆皇帝	恭宗	高宗興安元年 (452) 追尊諡號 並立廟號
拓跋濬	文成皇帝	高宗	
拓跋弘	獻文皇帝	顯祖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北齊）魏收，《新校本魏書》，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80。
（梁）沈約，《新校本宋書》，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75。
（梁）蕭子顯，《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78。
（唐）李延壽，《新校本北史》，臺北：鼎文書局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影印，1979。
（宋）司馬光，（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

二、專書

（一）中文

- 王仲羣，《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田餘慶，《拓跋史探》，北京：三聯書店，2003。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孫同勛，《拓跋氏的漢化及其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韓國磐，《北朝經濟史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二）日文

- 窪添慶文著，趙立新等譯，《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船木勝馬，《古代遊牧騎馬民の国—草原から中原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9。

三、期刊論文

- 王吉林，〈北魏繼承制度與宮闈鬥爭之綜合研究〉，《華岡文科學報》，第 11 期（1978），頁 93-125。
何德章，〈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7 輯（2000），頁 46-59。
李明仁，〈鮮卑拓跋氏君主繼承制研究〉，《興大人文學報》，第 34 期（2004），頁 631-672。
張繼昊，〈從數件史事論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燾的君權〉，《空大人文學報》，第

11 期（2002），頁 81-109。

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兩朝的世子監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4 期，頁 28-35。

蔡幸娟，〈北魏立后立嗣故事與制度研究〉，《成大歷史學報》，第 16 號（1990），頁 257-309。

嚴耕望，〈北魏尚書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8 本（1948），頁 252-360。

四、專書論文

（一）中文

牟潤孫，〈崔浩及其政敵〉，收入牟潤孫著，《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80-93。

鄭欽仁，〈北魏中常侍稿——兼論宗愛事件〉，收入鄭欽仁著，《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篇》，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頁 169-189。

（二）日文

漥添慶文，〈北魏の議〉，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頁 408-436。

漥添慶文，〈北魏の太子監國制度〉，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 187-206，後來發表〈關於北魏的太子監國〉，收入殷憲主編，《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85-97。

川本芳昭，〈景穆太子と崔浩〉，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 103-123。

（責任編輯：鄒武霖）

